

# 地理、進化與文明： 梁啟超、康有為海外詩中的世界圖像\*

江曉輝\*\*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 摘 要

海外詩是詩歌中較被忽視的類型，其背後卻反映了時代的發展與文明的特質。近代既是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也是海外詩快速發展的時代；其中，康有為（1858-1927）與梁啟超（1873-1929）的海外詩，因其學術、政治背景與遊歷，表現出當代其他詩人所無的格局，實為海外詩發展的高峰。他們的詩受到地理環境決定論和進化主義的影響，欲從世界不同文明的考察中尋找地理環境的決定因素，總結出諸如地理位置、海權、物質、殖民等影響進化的規律，供中國未來的發展借鑒。其視野與文化意識都與以往漢族中心主義有所不同，體現了面向海洋、積極匯入現代文明的轉向，呈現出一幅世界尺度的宏觀圖像。

**關鍵詞：**海外詩，梁啟超，康有為，地理環境決定論，進化主義

---

\* 本文為筆者在未出版之博士論文《「西學東漸」與晚清詩之新變》第四章第二節的基礎上擴充、改寫而成；曾於香港浸會大學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主辦之「凝視、傳衍與超越：中國文學的跨時代對話」第六屆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2021年10月27日）上宣讀。後蒙本刊兩位評審委員提供寶貴意見，以及編輯的細心校閱，謹此致謝。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員，電子郵件信箱：[konghiufai@gmail.com](mailto:konghiufai@gmail.com)

## 一、前言：航行的意義

戊戌政變的失敗，逼使康有為 (1858-1927) 和梁啟超 (1873-1929) 流亡海外。康梁流亡，固然是維新運動的大挫敗，卻是晚清詩歌改革以及海外詩發展的契機。詩界革命的構思和綱領，就在梁氏往夏威夷的途中催生，此次航程也使他寫下〈二十世紀太平洋歌〉；康氏在環球旅程中，又寫下豐富的海外詩，不論是質還是量，都堪稱近代的佼佼者。

康梁以外，晚清非無其他出色的海外詩；相反，隨著時人出使、留學、出遊、應聘、流亡、考察、定居的增加，佳作湧現。他們的詩次第反映了晚清文化、社會、政局的轉變，展現了將視野投向海洋／海外，對近代西方文明的理解和自身文明的反思。這既是海外詩的發展過程，也是詩歌革新的體現，更折射了傳統文明如何過渡到現代文明的諸面向。康梁詩歌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們很大程度上參與並推動了「轉型時代」<sup>1</sup> 的進程，其海外詩的創作恰在這時期之中。兩人的政治觀、文化觀、世界觀，同樣展現了轉型或過渡時期中／西／新／舊混雜、融合的特色，形成有別於晚清其他詩人的大視野，在海洋意識、華夷關係、文明進化等議題上，承載了與以往海外詩不同的複雜性。所以，一方面可以從康梁詩揭櫫晚清的時代性，另一方面也可從中探析海外詩在其筆下有何新發展。<sup>2</sup>

古代文化的焦點是內陸，古典詩歌的書寫場域主要也是陸地，歷來海洋書寫相對稀少，相關研究自然不多。海洋文學作為研究的概念和範疇，1975年由朱學恕提倡後，始帶起兩岸的研究風氣。<sup>3</sup> 羅宗濤 (1938-2018)、吳智雄、顏智英、廖肇亨、陳清茂、張高評等學者對晚清以前的海洋文學都有重要論述。與康梁相關的研究則有：隨著中國大陸在 2006 年提出「從周邊看中國」的議題及海洋文學漸受重視，晚清海外詩成為研究的視角之一，沙紅兵和程露都有相關論述。<sup>4</sup> 郭延禮是康

<sup>1</sup> 張灝著，任鋒編校，《轉型時代與幽暗意識——張灝自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轉型時代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與文化史上的重要性〉，頁 151-162。

<sup>2</sup> 「海外」相對「海內」的本土而言，本文將「海內」界定為當時政府設置行政機構，並有效管治的土地及水域；「海外」則是此外的範圍，既包含海洋，也包含陸地。

<sup>3</sup> 陳清茂，《宋元海洋文學研究（上）》（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頁 2。

<sup>4</sup> 沙紅兵，〈晚清海外詩：“從周邊看中國”〉，《文學評論》，1（北京：2018），頁 111-122；程露，〈清末民初“航海詩”的特徵及其現代性——以廣東文人黃遵憲、梁啟超、丘逢甲為例〉，《廣東開放大學學報》，26.5（廣州：2017），頁 26-30。

氏海外詩較早期的研究者。<sup>5</sup> 常雲、謝飄雲對此亦有相當全面的介紹。<sup>6</sup> 康氏遊蹤極廣，德國學者衛德明 (Hellmut Wilhelm, 1905-1990) 有文探討其寓日所寫《明夷閣詩集》。<sup>7</sup> 針對其南洋詩，高嘉謙探論南方漢詩的專書，對康氏設有獨立章節。<sup>8</sup> 譚勇輝亦曾對其《大庇閣詩集》展開討論。<sup>9</sup> 梁氏海外詩不多，較少受到關注，然而其〈二十世紀太平洋歌〉可圈可點，蔣英豪的論文是少數能挖掘其深意之作。<sup>10</sup>

上述研究中，郭延禮雖是這方面的先驅，使海外詩作為一種主題及類型慢慢受到關注，討論也廣泛，但稍欠深入。常雲、謝飄雲論述的局限與郭氏類同。沙紅兵雖採取「從周邊看中國」的新角度，將海外詩作為一種審視近代文明過渡的新視野和方法，但未留意到「周邊」及更遙遠的「海外」與本土距離不同，以及新學說的流行所形成詩人觀點的變化。程露把握到海外詩反映現代性的議題，卻忽略遊歷最廣的康有為詩，自然亦忽略了康氏所渴求的物質、商業和殖民這些現代性核心因素。衛德明、高嘉謙及譚勇輝所論都是東亞及南洋之作，著力於挖掘康氏複雜心態、處境，討論深入，不過未析論其遊蹤更遠、橫越大洋之作，而這部分正是康氏離開「周邊」，形成新文明觀念的關鍵。蔣英豪只聚焦一首詩，故能深入——特別是揭示詩中的「史詩」特質，無疑為傳統詩歌表現西方文學精神的「新意境」，提供新的切入點，然而梁氏形成新海洋意識和世界觀的中、西思想背景，猶有深論的餘地。

海洋既作為文明、國家間的屏障，同時也是交流的媒介，能否突破隔閡而與其他文明、國家交流，是能否匯入世界格局的近代性文明的指標。在這歷史進程下，海洋意識的強弱正是背後重要因素。西方歷史中「近世／近代早期」(early modern period) 的開啟，就是哥倫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 發現新大陸及後續的地理大發現，為後來的資本主義及殖民主義打下基礎。即使是被內藤湖南

<sup>5</sup> 郭延禮，〈論康有為的海外詩〉，《東岳論叢》，6（濟南：1984），頁 64-69。

<sup>6</sup> 常雲、謝飄雲，〈論康有為的海外詩〉，收入劉聖宜主編，《嶺南歷史名人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頁 127-176。

<sup>7</sup> Hellmut Wilhelm, "The Poems from the Hall of Obscured Brightness," in Lo Jung-pang (ed.), *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Tucson, AZ: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7), pp. 319-340.

<sup>8</sup> 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臺北：聯經出版，2016），〈詩、帝國與孔教的流亡——康有為的南洋憂患〉，頁 349-391；高氏關於南洋漢詩的論文還有：高嘉謙，〈近代漢詩與南海視域〉，《臺大東亞文化研究》，5（臺北：2018），頁 119-136。

<sup>9</sup> 譚勇輝，〈《大庇閣詩集》與康有為的南洋詩〉，《粵海風》，1（廣州：2015），頁 19-25。

<sup>10</sup> 蔣英豪，〈梁啟超的“史詩”——《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析論〉，《求是學刊》，4（哈爾濱：1997），頁 68-73。

(1866-1934) 稱為中國近世的宋代，其海洋意識和海上貿易也是超於前代。對地理的認識、利用，與歷史發展有著重要關聯；特別是突破熟悉的陸地或近海，與更遠的文明接觸，體現的不只是國力的拓展，更是文明間溝通交流的全球化過程的必然階段。這除了使不同文明在學習、競爭中革新進步，支持此海上交流的科學、物質發展、冒險精神，也是進化的基礎。故海洋意識牽動的是不同世界觀、歷史觀、文化觀的比較、反思和融攝，及現實勢力的競合關係。同時，對比局限於國內，透過書刊介紹的方式來認識新世界、增加新的文學材料，親身走向西方，在觀念上或物質上都更直接地影響晚清詩歌的革新。

因此，海外詩無疑是考察世界觀改變和詩歌革新的一把鑰匙。康梁海外詩在這兩方面都蘊涵重要意義，本文將建基於上述研究，補充未及之處；特別是梁氏在特殊的時空背景下如何有意地運用新舊學說，建構一套文明進化的模式，啟導中國未來的發展？康氏在與中國「周邊」拉開距離後的歐美行程中，新舊學說的揉合如何形成有別於前的文明觀？兩者的作品如何實踐詩歌革新？較諸以往海洋詩，又有何新發展？

## 二、從海內到海外：晚清海洋、海外觀念轉變下的早期海外詩

關於海洋觀念的討論，易牽涉大陸文明／海洋文明二分，簡單將傳統中國斷定為大陸文明，甚至作為構成某些民族性的依據。自從黑格爾 (G. W. F. Hegel, 1770-1831) 《歷史哲學》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以地理形勢為歷史發展和民族精神基礎的論述經日本傳入中國，再經梁啟超等人宣傳——特別是中國「和海不發生積極的關係」<sup>11</sup> 之類的論調不斷發酵，形成後來「大陸文明／海洋文明」的二分，以中國文明為大陸文明而以西方為海洋文明的片面論述，當今學界對這種論述多有批判。

不過，諸如不應將大陸文明／海洋文明作簡單二分、古代中國有領先航海技術和事業等批判，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似乎未能否定早期中國海洋觀念較陸地觀念薄弱。<sup>12</sup> 宋以後海洋文化主要只及於東南沿海地區，且在清中葉海禁後進一步衰

<sup>11</sup> 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北京：三聯書店，1956），〈緒論·歷史的地理基礎〉，頁 135。

<sup>12</sup> 林肯·潘恩 (Lincoln Paine) 著，陳建軍、羅燦英譯，《海洋與文明：世界航海史》（新北：廣場出版，2018），頁 228-229。

竭。海洋活動及海洋意識的發展歷史，並非一直處於增長狀態。陳清茂將近代前的海洋活動分作四階段，明至清中葉已是盛極而衰。<sup>13</sup> 從地理而言，中國版圖廣大，川勝平太就指出桑原隲藏 (1871-1931) 以淮河為界，將中國分為北支那和南支那，表現出「大陸中國」和「海洋中國」的面孔。<sup>14</sup> 觀近代以前造船業、通商口岸及對海外諸國交通取道，基本上都限於江蘇、浙江、福建、廣東這些東南沿海省分。川勝平太所指的「海洋中國」，亦是以東南亞為中心，接連中國南方沿海省分的「環中國海」。<sup>15</sup> 整體而言，古代中國海洋觀念和文化，較諸陸地觀念和文化，仍相對薄弱。

近代時期因鴉片戰爭的戰敗而開始，這與海洋觀念的改變是同步的。戰前西北問題及與俄國關係才是清政府首要處理的國際問題。戰後，「海洋時代的戰爭和軍事關係才逐漸成為漢族士大夫論述的基本出發點，並促成了士大夫對清朝歷史、文化認同、國家改革和中國的地緣政治關係的重新認識」。<sup>16</sup> 戰敗使時人改變對朝貢體系的南洋國家的態度，當時的海外詩就逐步反映這種轉變。

1847 年，林鍼受聘赴美教授中文，兩年後回國將見聞寫成《西海紀遊草》。1866 年，斌椿 (1804-1871) 率團出訪歐洲，後將途經歐洲多國的經歷寫成《海國勝遊草》和《天外歸帆草》。斌椿途經中國周邊朝貢體系國家之一的越南時，對西方勢力的進入、朝貢體系日漸崩解，彷彿毫無警覺。他們好奇的還是西方的科技、科學和風俗、建設。詩歌語言則少新名語，而以比喻、舊典故指陳新事物。

黃遵憲 (1848-1905) 1877 年使日時開始創作《日本雜事詩》，是以連章絕句與長序記錄海外事物之寫作方式的代表。其以一詩一事物的方式，對日本古今各方面作全景式掃描，而在各詩後以長注解釋和討論。其詩語仍相當傳統，使用舊典故指涉新事物，新名詞的使用多在注文之中。後來張祖翼 (1849-1917) 遊英時寫的《倫敦竹枝詞》、王以宣 (生卒年不詳) 的《法京紀事詩》，都受到《日本雜事詩》影響，寫法類似，都是以絕句配合注，作專門描寫。

由中國赴歐，必經南洋。南洋國家很早便被納入中國的朝貢體系，成為漢文化圈南方的界限及海上屏障。明中晚期歐洲的勢力漸漸進入南洋，清朝的海禁及內縮的海洋政策，使其盤踞勢力更甚，到晚清的經略由內陸轉向海洋時，以往的朝貢體

<sup>13</sup> 陳清茂，《宋元海洋文學研究（上）》，頁 19-99。

<sup>14</sup> 川勝平太著，劉軍等譯，《文明的海洋史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頁 139-140。

<sup>15</sup> 同前引，頁 134。

<sup>16</sup> 汪暉，《帝國與國家》，《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 2 部（北京：三聯書店，2004），頁 613。

系已然動搖。汪暉指出晚清南洋區域內部存在著錯綜複雜、犬牙交錯的內外關係。<sup>17</sup> 古代作為夷夏分野的南方界限，已然模糊。特別是中法戰爭後，本為朝貢體系重要成員且與中國接壤的越南，成為法國保護國，無疑引起晚清知識人的憂慮，赴歐或赴南洋者經過南海，都不免以詩抒發忡忡之懷。

1887 年潘飛聲 (1858-1934) 赴柏林教書，經過虎門時已有「未來風雨旌旗動，欲上魚龍鼓角驚。扼手最難形勝險，問誰鞭石作長城」的警覺與感慨。到達七洲洋海域，面對下一段航程越南，寫下〈七洲洋放歌〉：「頻年外域肆蜃鱉，越南瘴霧山海愁。銀潢未挽洗兵甲，犀弩不射橫江流。如此天險竟難扼，安用天塹防神州。」<sup>18</sup> 感嘆南方屏障一破，天險便失，但仍希望政府的海上力量驅趕外國勢力。1890 年黃遵憲經過南洋水域，慨嘆：「及明中葉後，朝貢漸失職。」他經過之時，已是「咸歸西道主，盡拔漢赤幟」。稍後轉赴新加坡任外交官，又來到形勢複雜尷尬的南洋，其〈新嘉坡雜詩十二首〉持華夏中心觀指新加坡本是「地猶中國海，人喚九邊門」，但在西方的勢力下，東南亞國家已「東西帝並尊」，甚至「諸蠻盡向西」，王化的範圍已由本來的「諸侯」退縮。<sup>19</sup> 丘逢甲 (1864-1912) 的海外足跡在東亞及東南亞一帶，都在漢文化圈中，縱然離開中國本土，仍慣以漢族中心主義來看待自身處境和事物。1900 年的〈七洲洋看月放歌〉寫他想到「獨惜南溟島國盡隸他人屬，坐歎熱帶之下無雄才」，昔日的屏藩諸國已入西人之手，只能寄懷詩中：「自是詩中海權大，萬里南天開海界。」〈將之南洋留別親友〉（其七）云：「驪歌聲裏即天涯，胡越何妨竟一家。大海從新開世界，羣山依舊拱中華。貢金待鑄先朝史，碾玉教圖異域花。島國王侯看下拜，書生此念太豪奢。」<sup>20</sup> 依舊想像著王化廣被、萬國來朝的氣象。

從洋務運動到此時期，對海外科技、社會風俗、地理新知的描寫依然是海外詩的重點，詩語上雖漸漸使用新名詞，但通常相當克制、注重典雅，更多以比喻和傳統典故指涉新事物。詩人亦慢慢重視中外社會、政治的比較，作出一定的反思，甚至有啟蒙的創作動機，已少初期的獵奇之感。這固然是對海外事物的認識日漸豐富，也由於國勢變化的影響。特別是朝貢體系的動搖，使其每經過「環中國海」都

<sup>17</sup> 同前引，頁 654。

<sup>18</sup> 張祖翼等著，穆易校點，《倫敦竹枝詞·法京紀事詩·西海紀行卷·柏林竹枝詞·天外歸槎錄》（長沙：嶽麓書社，2016），《西海紀行卷》，〈過虎門〉，頁 95；頁 96。

<sup>19</sup> 黃遵憲著，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 6，〈錫蘭島臥佛〉，頁 454；卷 7，頁 587-588、589。

<sup>20</sup> 丘逢甲著，丘鑄昌校點，《嶺雲海日樓詩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卷 7，頁 163、153。

產生對局勢的憂慮及重新鞏固南方屏藩的願望。當詩人遠離「周邊」或距離陸地越遠，就會形成視野的差異，越能從世界文明的高度回顧，越能凸顯地理空間的轉換對文化意識的影響。

### 三、新舊世紀與地理界域的過渡：

#### 梁啟超〈二十世紀太平洋歌〉的世界視野

康有為和梁啟超既是師徒，又同是晚清改革的推行者，故慣常以康梁並稱；即使論及海外詩，學界亦常以康梁並論。不過，雖然康氏海外詩數量遠多於梁氏，但其重要之作都寫於梁氏〈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之後，甚或受到此詩的影響；同時，梁氏創作的時空背景及詩歌的氣象與用意，實有替海外詩開一新格局的意義，故此先論梁氏之作。

##### (一)時空向度與進化之義

梁啟超詩作不多，其海外詩涉及的主要有日本、夏威夷、澳洲、臺灣等地，當中與海洋關係較大的約有數首。以量來說，遠不及康有為，較諸早期海外詩人，亦有不如下，且大部分作品的水平未見特別出色。然而，他赴夏威夷途中寫的〈二十世紀太平洋歌〉，卻是近代海外詩的經典之作。原因在於此詩寫於特殊時空背景之下，不能有二，故具有其他海外詩所沒有的獨特意涵；而且，比諸同時代及他的其他海外詩，他首先強調海洋意識對於文明進化的關鍵作用，並融合中西學說建構了一套以地理、進化與文明的關係為核心的世界史觀，格局宏大；此寫作方式和主題，亦是前所未見，有著獨特的時代意義。

單看〈二十世紀太平洋歌〉的詩題，就已透露了劃時代的象徵意義。詩題可圈可點之處，在於使用了「世紀」這一新名詞和概念。古代中國使用的干支和君主年號紀年，都較難表現歷史階段的差異及進步的觀念。世紀 (century) 觀念，象徵著進化主義 (evolutionism) 賴以為基礎的線性時間觀。梁啟超深受進化主義影響，要表現歷史進程，「世紀」無疑比干支或年號更適合。十九世紀對於中國是翻天覆地、與古昔判然有別的變局。干支紀年和年號都難以表現這些特徵，且無法表現進入二十世紀時的複雜心理。梁氏在開篇敘述了創作緣起後，特別強調此詩時空背景之特殊：

乃於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臘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橫渡太平洋。

……

驀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是新舊二世紀之界線，東西兩半球之中央。

不自我先不我後，置身世界第一關鍵之津梁。（頁 5426）<sup>21</sup>

梁氏此行是受舊金山新成立之中國維新會之邀，由東京赴美。蔣英豪據《夏威夷遊記》所載，1899 年 12 月 31 日午後梁氏已登夏威夷，推測此詩非寫於當日晚上至次日凌晨，應是寫於 24 日至 27 日的船上。<sup>22</sup> 梁氏將寫作時間設定成世紀之交的夜半，固然是「刻意為達到戲劇效果而作的安排，不足作為憑據」，<sup>23</sup> 然「刻意」背後，可見他將世紀之交作為新舊世界過渡象徵之用心。

詩雖非實寫於「新舊二世紀之界線」，卻確實寫於「東西兩半球之中央」。對於古代中國來說，「海」是有邊界意義的，<sup>24</sup> 近海往往是華夏文明的邊域。越過日本而航向太平洋彼方，實有從地理／文化邊界內跨出邊界外的意義。地理的過渡，首先寓意梁氏世界觀的開拓。他在《夏威夷遊記》中說十七歲上京赴考時，還是「鄉人」，因為世界風潮激蕩，不得不成為「國人」乃至「世界人」（頁 1217）。由鄉而國，由國而世界，是識見的拓展，也是政治舞臺及遊蹤的拓展。其背後的意義如李歐梵所言：

在他個人的經驗裡面，真的是中國的想像版圖擴大了，也就是說從中國到其他國家，要經過幾個不同的疆域，那麼疆域的界線也就開始變得敏感。不像中國古時候就是一個“中朝”，所謂“Middle Kingdom”，中國是中心，蠻夷是在旁邊的。<sup>25</sup>

自政體而言，此過渡代表三種政體發展階段：中國的君主制、日本的立憲制和美國的共和制。《夏威夷遊記》云：

<sup>21</sup> 本文所引梁氏詩文悉出於梁啟超，《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為方便引述，下文逕於引文後標明頁碼，不另作注。

<sup>22</sup> 蔣英豪，〈梁啟超的“史詩”〉，頁 68-69。

<sup>23</sup> 同前引，頁 68。

<sup>24</sup> 季岸先選輯，《中國古代海洋意象史輯》（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10），頁 2。

<sup>25</sup> 李歐梵演講，張曉旭、劉雨薇整理，〈西學東漸：晚清文學中的烏托邦想像——“中西文化關係與中國現代文學”系列演講第二講〉，《關東學刊》，2（長春：2018），頁 57。



於是去年九月，以國事東渡，居於亞洲創行立憲政體之第一先進國，是為生平遊他國之始。今年十一月，乃航太平洋，將適全地球創行共和政體之第一先進國，……。（頁 1217）

〈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亦云：

扶桑之居讀書尚友既一載，耳目神氣頗發皇。  
少年懸弧四方志，未敢久戀蓬萊鄉。  
誓將適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問政求學觀其光。（頁 5426）

由中國的君主制，到亞洲範圍（日本）的君主立憲，再到全球範圍（美國）的共和政體，當遊蹤和眼界越來越遠，對先進政體的嚮往就越來越高。太平洋彼端，正是當時梁氏認為最先進的政體，太平洋則是亞、美兩大陸間的水域，作為兩種文明、政體的區隔。橫越太平洋，於是有著連通、過渡、邁進的意義。

新舊世紀與東西半球的跨越，表面上是時間與空間的過渡，背後卻有著進化主義的意識型態。1890 年代初梁氏從學康有為，深受康氏引申自公羊三世說的本土進化主義影響；赴日初期，則開始轉向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Social Darwinism)，因此在此時期，其進化主義是有著混雜性的。三世說是東漢今文經學家何休 (129-182) 歸納《公羊傳》義例為「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的對遠近時代記載的不同筆法：

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羸摘，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sup>26</sup>

於是有了「衰亂」（「所傳聞之世」）、「升平」（「所聞之世」）、「太平」（「所見之世」）的三世說。後來，三世的不同筆法和記述的偏重被引申為進化的歷史觀。<sup>27</sup> 康氏《春秋董氏學》更配以「小康」和「大同」：

<sup>26</sup> 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 1，〈隱公元年〉，頁 7a。

<sup>27</sup> 湯志鈞，《近代經學與政治》（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167。

“三世”為孔子非常大義，托〔託〕之《春秋》以明之。所傳聞世為據亂，所聞世托〔託〕升平，所見世托〔託〕太平。亂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漸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遠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備也。（第2集，頁324）<sup>28</sup>

其《論語注》復將各國的政治、社會制度的發展，配對三世：

人道進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為部落，而成國家，由國家而成大統。由獨人而漸立酋長，由酋長而漸正君臣，由君主而漸為立憲，由立憲而漸為共和。……蓋自據亂進為升平，升平進為太平，進化有漸，因革有由；驗之萬國，莫不同風。（第6集，頁393）

所以，由君主制的中國，到立憲制的日本，再到共和制的美國，既是地理尺度的日漸開展，也有著進化的向度。

康氏由始至終都認為政制進化只能循序漸進，不可躡等：「今日為據亂之世，內其國則不能一超直至世界之大同也；為君主專制之舊風，亦不能一超至民主之世也。」（第6集，〈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頁313）否則國家就會大亂，對自由亦十分戒備；加上他受光緒帝（r. 1875-1908）恩遇，更加反對排滿的革命。梁氏本亦遵循師說，但赴日後大量閱讀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等共和主義思想家作品，並且與孫中山（1866-1925）等革命派交往密切，轉向支持共和革命，商議兩黨合作，這便與「進化有漸」的師說產生分歧。<sup>29</sup> 他用「誓將」、「適彼」的《詩經·碩鼠》典故凸顯對「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之美國的嚮往背後，正有此原因。梁氏相信歷史進步不斷進行、不可逆轉，邁入二十世紀將是變化的關口，進入新世紀就有了時間向度上的進化意味。詩歌接著說：

胸中萬千塊壘突兀起，斗酒傾盡蕩氣回中腸。

獨飲獨語苦無賴，曼聲浩歌我二十世紀太平洋。（頁5426）

<sup>28</sup> 本文所引康氏詩文悉出於康有為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為方便引述，下文逕於引文後列明集別、頁碼，不另作注。

<sup>29</sup> 石雲豔，《梁啟超與日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頁369-428。

梁氏將自己塑造為一個先覺的獨醒者。因為醒覺，所以更有啟蒙的責任。「不自我先不我後」一語中，「我」被塑造成一個大寫的、因處於獨一的時空背景下被歷史賦予獨特角色的「我」。這個「我」既是梁氏本人，也象徵在轉型中面對危險與機遇的中國。他不像其他海外詩的詩人，把自己當作海上的過客；而是視海為一個時代，把自己和中國當作參與者，投入這新時代的浪濤中。

## (二) 文明發展的規律

在敘述完創作背景後，梁啟超正式闡述世界文明發展的宏大敘事。同時，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引入也使詩歌呈現以往海外詩所無的視野與格局。梁氏先運用生物進化論「物競天擇」的觀點說明洪荒世界中早期生物的狀況。詩云：

爾來千劫千紀又千歲，倮蟲緣虱為其鄉。  
此蟲他蟲相閱天演界中復幾劫，優勝劣敗吾莫強。  
主宰造物役物物，壯〔莊〕巖地土無盡藏。（頁 5426）

然後筆鋒一轉，寫低等生命進化出文明，已脫離純粹生物性，便改用「三世進化」的觀點「初為據亂次小康，四土先達爰濫觴」，帶出四大文明古國在歷史發展階段的定位為「厥名河流文明時代第一紀，始脫行國成建邦」（頁 5426）。「據亂」是後來「小康」社會的「濫觴」，梁氏並指出四大文明都依憑重要的河流建立。「河流文明時代第一紀」和「二十世紀太平洋」一樣，都有著時間、空間的內涵，時間向度（「第一紀」）結合了地理向度（「河流」）。以地理因素說明一地域的文明特色和發展階段，是當時十分流行的論調，梁氏更是高唱此調的先驅。

地理環境決定論是解釋人類文明發展、生產方式、種族差異等，如何受到地形與氣候等因素影響的理論。此理論在近代由孟德斯鳩首唱，後由黑格爾、英國巴克爾 (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德國拉采爾 (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美國森普爾 (Ellen Churchill Semple, 1863-1932) 發展而廣為流行。日人浮田和民 (1859-1946)《史學通論》和志賀重昂 (1863-1927)《地理學》闡釋此說。梁啟超並非直接閱讀西方著作，而是在逃亡日本時，通過閱讀兩人著作來理解地理環境決定論。他第一篇介紹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文章，即寫於 1902 年的〈地理與文明之關係〉，便抄自《史學通論》第五章〈歷史與地理〉，此章又節錄自黑格爾《歷史哲學》和巴克爾《英國文明史》，而後者深深影響了明治時期日本人對文明與地理環

境關係的觀念。同年梁氏的〈亞洲地理大勢論〉、〈歐洲地理大勢論〉、〈中國地理大勢論〉均以同樣受巴克爾影響的志賀重昂《地理學》為藍本改寫，不過〈中國地理大勢論〉更多梁氏的發揮。<sup>30</sup>

梁氏這些著作都是從地理形勢影響文明與民族性這一觀點加以闡釋，影響甚大。如郭雙林所指：「當時的地理環境決定論者往往喜歡把世界不同地方或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某些社會現象視為帶有規律性的普遍現象。」<sup>31</sup> 梁氏這些著作即強調「某些社會現象」的「規律性」。石川禎浩比較了梁氏地理學觀念的轉變：其赴日前對地理學的觀念是地方志、經典的地理研究或外國地方的資訊，清代的地理學只依附於歷史研究；以上這四篇著作則顯示其觀念已轉變，地理成為了決定人類歷史本身的主要因素。梁啟超正是在浮田和民、志賀重昂等人的著作中，發現了貫通地理與歷史、地理與文化的人類歷史的「普遍原則」。<sup>32</sup> 雖然梁氏上述諸文撰於1902年，然而《史學通論》的原稿為浮田氏1897年的大學講義，早已流傳社會，<sup>33</sup> 成為〈二十世紀太平洋歌〉立論的依據。

「河流文明時代第一紀」經過四千多年發展，進入「斯名內海文明時代第二紀」的「內海文明」。詩云：「此後四千數百載，群族內力逾擴張。乘風每駕一葦渡，搏浪乃持三歲糧。」因為人口增長，族群從河流流域擴張至海邊，當中地中海文明最為繁盛：「就中北辰星拱地中海，蔥蔥鬱鬱騰光芒。岸環大小都會數百計，積氣森森盤中央。」（頁5426）地中海地理形勢之特殊和重要性，黑格爾早已論及：「地中海是地球上四分之三面積結合的因素，也是世界歷史的中心。」<sup>34</sup> 地球上的三大洲包圍地中海，地中海有特長的海岸線，又是平靜的內海，宜於航行，因而三大洲的文化、物質容易在地中海交流融合。浮田氏受競爭進化思想影響，更強調「於此海濱民，交通、貿易、殖民、戰爭等，凡便於人類社會競爭之為者，一

<sup>30</sup> Ishikawa Yoshihiro (石川禎浩), "Liang Qichao, the Field of Geography in Meiji Japan, and Geographical Determinism," in Joshua A. Fogel (ed.), *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4), pp. 160-161; 郭雙林, 《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頁51-53。

<sup>31</sup> 郭雙林, 《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 頁68。

<sup>32</sup> Ishikawa Yoshihiro, "Liang Qichao, the Field of Geography in Meiji Japan, and Geographical Determinism," pp. 158-159, 169.

<sup>33</sup> 蔣俊, 〈梁啟超早期史學思想與浮田和民的《史學通論》〉, 《文史哲》, 5 (濟南: 1993), 頁28。

<sup>34</sup> 黑格爾, 《歷史哲學》, 〈緒論·歷史的地理基礎〉, 頁131。

集之於此地中海」。<sup>35</sup> 梁氏〈地理與文明之關係〉完全襲取此說。

當地中海周邊人口滋生、互相競爭、資源不足，便要往更遠的地方尋找資源。詩中繼述新大陸的發現：

揭來大洋文明時代始萌蘗，互五世紀堂哉皇。

其時西洋權力漸奪西海席，兩岸新市星羅棋布氣焰長虹長。（頁 5427）

進入「大洋文明時代」第三紀，大洋兩岸城市取代地中海成為歷史的新焦點，此亦是承黑格爾之論。黑格爾認為地中海是舊世界的心臟，而（北）美洲因為政體、人民性格、宗教、土地、國防等因素，「亞美利加洲乃是明日的國土」。<sup>36</sup> 浮田氏將社會進化分為兩期：第一期是政府要以壓制的手段建立秩序，令人民服從，進而能自治；第二期的要點是進步，方法是在法律範圍內，增加個人之自由與社會自由發展的動力，美國則是其中的典型。此階段文明的發展，已可克服地理的限制，並利用地理資源，使隔閡之地能互相往來。<sup>37</sup> 故梁氏云：

世界風潮至此忽大變，天地異色神鬼瞠。

輪船鐵路電線瞬千里，縮地疑有鴻秘方。

四大自由塞宙合，奴性銷為日月光。

懸崖轉石欲止不得止，愈競愈劇愈接愈厲，卒使五洲同一堂。（頁 5427）

「卒使五洲同一堂」呼應「初為據亂次小康」，指向大同世界，而此大同世界乃經科學的發展、自由的增長和道德的改進而來，是「愈競愈劇愈接愈厲」競爭進化的結果。

通過詩歌，梁啟超為我們展示了一幅世界文明的圖像。在圖像之中，過去被無限放大，作為「天下」的中華文明，在地理上卻未成為世界的中心，只是四大古文明之一。從地理角度看，雖然這四大古文明各有源頭的意義，但位處內河之側，各在大陸上的一方，因離海較遠及未有遠航技術，難以藉海上交流。人口壓力使族群

<sup>35</sup> 浮田和民著，羅大維譯，《史學通論》（上海：進化譯社，1903），頁 56。

<sup>36</sup> 黑格爾，《歷史哲學》，〈緒論·歷史的地理基礎〉，頁 130。

<sup>37</sup> 浮田和民，《史學通論》，頁 69-72。

向外擴散，文明的重心漸移向海濱，發展成內海文明；貿易的需求、海洋意識的增長和航海技術的發展，才使海上的交流變得頻繁和重要。經過海、陸的中轉，歐、亞、非三大陸的文明匯合到地中海，成為舊世界的中心。文化的交流、資源的壓力、商業的競爭，以及久在內海培養的海洋意識，使地中海地區產生了遠航以尋找新市場、新殖民地的需求。北美洲如同地中海吸收著不同文明，加上廣大的地理資源，政體、宗教革新形成人民的新道德，使北美成為新世界的中心。科技的發展使航行大洋、遠洋通訊成為可能，強化駕馭海洋的意識，爭取海洋資源成為文明發展的手段。

由河流到內海到大洋，諸文明的擴張是內至外，以能否跨越海洋為分野，這文明世界的圖像有著地理的向度。「第一紀>第二紀>第三紀」不只是時期的劃分，也是文明形式的演進，後一級比前一級更接近海洋，更能利用資源改善生活。這是一種文明進化的模式，其驅力則是競爭。結合時間向度和地理向度，梁氏展示文明進化的規律：越進化的文明在地理上越接近海洋，科技上越能利用海洋，人民也越具備海洋意識。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以文明所在的地理位置作的分期方式，並未見於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黑格爾在《歷史哲學·緒論·區分》一節，確實對世界歷史的發展作了比喻式的敘述。他認為隨著「精神」(spirit)的轉移，「世界歷史從“東方”到“西方”，因為歐洲絕對地是歷史的終點，亞洲是起點」。東方國家是「歷史的幼年時期」；中亞細亞是「少年時代」；希臘世界是「青年時代」；羅馬國家是「壯年時代」；日爾曼國家是「老年時代」。<sup>38</sup> 這種分期的基礎和方式與梁氏不同，更重要的是《歷史哲學》此部分浮田氏在《史學通論》中並未介紹，所以梁氏應無由得知。而《史學通論》「社會進化第一期」和「社會進化第二期」之區分方式乃在社會與人民擁有自由之程度，亦與梁氏分期有別。故梁氏以此分期方式展示文明進化的地理圖像，似乎是其獨到創見。

### (三)新世紀的願景

文明進化既然建基在地理因素之上，具有規律性，那麼，地理因素就不只決定了過去，也可從中推論出未來的進化方向。

梁啟超在以日本國粹主義者志賀重昂〈亞細亞地理考究の方針〉為本而「略加己意」的〈亞洲地理大勢論〉中，引用基約 (Arnold Henry Guyot, 1807-1884) 論歐

<sup>38</sup> 黑格爾，《歷史哲學》，頁 148-155，引文見頁 148。

洲發達之原因在於其地理之「易透達」(permeability)，而認為歐洲的結構、規模小，故易於滲透；亞洲則規模絕大，故難於滲透。言下之意，歐洲之滲透已飽和，亞洲則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故說：「亞洲之所以為亞洲者，不在現在而在未來也。」(頁 921)繼而又指亞洲多國已被歐美列強鯨吞蠶食，說：「而他日有用之之資格者，其為習居此土而有經驗之中國人乎？其為慣用他地而有經驗之歐洲人乎？」(頁 923)對比志賀重昂〈亞細亞地理考究の方針〉原文和《湖北學報》所載的翻譯〈亞細亞地理考究之方針〉，<sup>39</sup> 均不見此二語，當為梁氏「略加己意」。志賀氏雖謂中國之興衰關乎亞洲福祉，然重點仍在強調日本在亞洲諸國中未受歐洲列強瓜分之獨立性。梁氏「略加己意」，將重點放在中國之未來，既有危險，亦有機遇，且語氣中流露「習居此土而有經驗之中國人」更有資格亦更有把握利用亞洲的資源。

那麼，中國又有何資源可憑藉？詩中敘述了大西洋兩岸的發展後，把重點拉回太平洋：

太平洋，太平洋，大風泱泱，大潮滂滂。  
張肺歛地地出沒，噴沫冲天天低昂。  
氣吞歐墨者八九，況乃區區列國誰界疆。  
異哉！似此大物隱匿萬千載，禹經亥步無能詳。  
毋乃吾曹軀殼太小君太大，棄我不屑齊較量。  
君兮今落我族手，遊刃當盡君所長。(頁 5427)

太平洋之廣大，無從區分疆界，也不像陸地可劃分疆界；既不能區分，就該是世界共有的資源。但中國雖然在太平洋之一端，對此卻未詳加探索和重視。現在國人既已醒覺海洋的重要，自當好好利用。

或許是修辭策略的需要，或是故意要強調古時忽略太平洋和當時重視太平洋的對比，梁氏此處的論述省略了中國對南洋的經略和影響。南洋海域具備了一個與地中海相似的特點，就是不同的文明在此匯合交流：「東南亞之所以會成為海洋亞洲的中心，首先是因為其獨特的地理條件。東南亞地處海洋中國與海洋伊斯蘭的交匯

<sup>39</sup> 志賀重昂全集刊行會編，《地理學》，《志賀重昂全集》第 4 卷（東京：志賀重昂全集刊行會，1928），頁 323-337；譯文參志賀重昂，〈亞細亞地理考究之方針〉，《湖北學報》，2、3（武漢：1903），頁 1-5、6-11。

處，位於東西方文明海上通道的十字路口。」<sup>40</sup> 中國古代因貿易需要，唐宋與東南亞國家海上交通相當頻繁。不過，亦由於強勢的文化影響力和明清偏重內陸的政策，長期未正視海上的對手和外來文化，因而難以發生勢均力敵的競爭——而這正是地中海文明得以發展至大洋文明的重點所在。所以，梁氏在描繪了一幅列強互相爭逐太平洋、弱肉強食的圖像後，便說：

我尋風潮所自起，有主之者吾弗詳。  
物競天擇勢必至，不優則劣兮不興則亡。  
水銀鑽地孔乃入，物不自腐蟲焉藏。  
爾來環球九萬里，一砂一草皆有主。旗鼓相匹強權強。  
惟餘東亞老大帝國一塊肉，可取不取毋乃殃。（頁 5427）

詩歌雖然敘述列強競爭的殘酷，但梁氏卻沒有流露對競爭的恐懼，反而表現出渴望參與競爭的高昂情緒。梁氏在日本時深受加藤弘之（1836-1916）影響，認為「世界之中，只有強權，別無他力，強者常制弱者，實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則欲得自由權者，無他道焉，惟當先自求為強者而已」（《自由書·論強權》，頁 353）。嚴復（1854-1921）譯介《天演論》時便將「物競天擇」一語從自然界應用到人類社會，優勝劣敗在社會達爾文主義中更是社會進步的現實，強權乃是達至進步的唯一途徑，所以梁氏在詩中提出「旗鼓相匹強權強」的重要。康有為反對競爭，批評：「其妄謬而有一知半解如達爾文者，則創天演之說，以為天之使然，導人以競爭為大義。於是競爭為古今世界公共之至惡物者，遂揭日月而行，賢者皆奉之而不恥。」（第 7 集，《大同書》，頁 183）而以「仁」為進化的軌道：「凡世有進化，仁有軌道，世之仁有大小，即軌道大小。」（第 5 集，《孟子微》，頁 415）故梁氏謂：「先生之論理，以“仁”字為唯一之宗旨。」（〈南海康先生傳〉，頁 488）而梁氏新接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則是以優勝劣敗的競爭為社會進步的動力。當今的文明和世界秩序都是通過殘酷競爭而來的，追求強權是獲得自由平等和獨立強大的唯一途徑。

梁氏最後扣回「二十世紀太平洋」的關鍵性，指促成大洋文明的因素已齊備於

<sup>40</sup> 川勝平太，《文明的海洋史觀》，頁 134。林肯·潘恩也認為：「有時候，東南亞水域被看作亞洲的地中海，二者在地理和文化上有著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林肯·潘恩，《海洋與文明》，頁 226。



太平洋：「爾時太平洋中二十世紀之天地，悲劇喜劇壯劇慘劇齊鞞。」太平洋將是二十世紀的世界舞臺。要登上此舞臺，與列強競爭，就要走出陸地、走向海洋：「吾聞海國民族思想高尚以活潑，吾欲我同胞兮御風以翔，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揚。」（頁 5427）對於海洋與民族性之關係，〈地理與文明之關係〉有進一步闡明：

海也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者也。陸居者以懷土之故，而種種之繫累生焉。試一觀海，忽覺超然萬累之表，而行為思想，皆得無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卻不可不先置利害於度外，以性命財產為孤注，冒萬險而一擲之。故久於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頁 944）

然後他又指出瀕海之國或種族，比不瀕海者進步。此種冒險勇猛的精神，正是參與新世紀競爭所必需。正如後來「新民」的目的，他希望透過改變民族性格來改變國家發展。一方面，對共和革命的追求，以及對新民、強權、海洋意識的提倡，在民智未開的國內仍是「天黑水黑長夜長」、「滿船沉睡我徬徨」，使他倍感孤獨；另一方面，從詩的結尾「緯度東指天盡處，一線微紅出扶桑，酒罷詩罷但見寥天一鳥鳴朝陽」又可見他對未來的信心（頁 5427）。

蔣英豪引 M. H. Abrams (1912-2015) 指出一般「史詩」(epic) 的特點：「其體裁是敘事長詩，寫的是嚴肅的題材，其主角是個英雄，對整個民族有重大意義，他的行為決定了國家的命運，作品中有廣泛的視野和壯觀的氣勢，並包容了當時的世界及其大部分學識。」<sup>41</sup> 並指此詩具有「史詩」的這些特點，確是卓見。梁氏在詩中的形象就像背負國族歷史和希望的英雄，他恰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乘船橫越太平洋的航行，在詩中被營造成冥冥中的巧合或被賦予某種使命，個人的航程象徵中國由陸地轉向海洋、匯入近代文明的轉型過程。只有具備冒險勇猛的海洋意識，跨出大陸文明對當時中國發展的限制，才能進入下一個時代。在進化主義的時間維度與地理環境的空間維度所交織的圖像中，此詩展現了超越個人，甚至超越中國，探及世界文明發展的大視野。

<sup>41</sup> 蔣英豪，〈梁啟超的“史詩”〉，頁 71。

## 四、如何強大：康有為海外詩對文明的考察

康氏最重要的海外詩寫於〈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之後，但由於他遊歷的時間長、遊歷的國家眾多、詩作甚夥、牽涉的議題也甚繁，加上他是帶著明確的考察目的去作環球之遊，故其海外詩另有〈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所不及的複雜性。特別是在亞洲期間和遠赴歐美期間寫的海外詩，差別甚大，當中的對比可以透露出他所處「周邊」的遠近與他思想轉變的關係。

### (一)從「周邊」出發<sup>42</sup>

康有為遊歷三十一國，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清廷緝捕，無法返國，另一方面是尋求外援，考察西方國家的文化與政教，探索自強之道。地形與世界文明、政教的關係是其考察重點之一，也是其海外詩的重要內容；不過，康氏對此關係，並非從流亡伊始便注意到，而是隨著與中國本土距離的拉遠而日漸重視。

康氏 1898-1903 年在日本、南洋、印度之作，分別收入《明夷閣詩集》、《大庇閣詩集》、《須彌雪亭詩集》。《明夷閣詩集》敘述出逃過程與在日本的生活。康氏死裡逃生，猶如驚弓之鳥，詩集中瀰漫著維新運動及政變失敗的悲憤情緒。日本是漢文化圈裡的國家，離中國較近，風景文物又與中國較為相似，這種地理上的接近與風景文物的相似性，使康氏在描寫日本景點與活動時，更容易召喚出家國憂思：〈桂湖村邀集上野鶯亭，即席索詠。口占，兼示同席陸羯南、三宅雪嶺、□□藻洲，皆東國記者之盛名能文者〉（其四）寫鶯亭風景：「最是新亭好風景，河山故國正愁人。」（第 12 集，頁 195）運用「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sup>43</sup> 的典故，指鶯亭風景與故國不殊，但這「不殊」卻又勾起「山河之異」的寄居流寓之

<sup>42</sup> 所謂的「周邊」，可以指當時中國版圖周圍，有明確地理界定的「外國」；也可以指在歷史進程中作為「中國」政治、文化核心區域「周邊」的族群。「中國」與「周邊」的界義不只在地理上，也在文化和制度上，其關係是變動的，時而分合、時而包含、時而重疊，「外國」可以變成「中國」，「中國」也可以變成「外國」。此處所謂康氏遊歷的「周邊」，都有明確的地理版圖，而且都在海外，但在文化上卻或多或少受漢文化的影響。康氏初期的海外詩，是指他在出發往歐洲之前的作品，此時期他仍在中國的「周邊」國家。相關論述參葛兆光，《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sup>43</sup>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王根林校點，《世說新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卷上之上，〈言語〉，頁 19。

感；日本雖是海外之國，卻處處映現故國的影子。一方面，日本的景色和庇護使他  
有安身之感；另一方面，從〈登箱根頂浴蘆之湯〉（其二）「茫茫睨故國，悵悵非  
吾土」、〈蘆湖樓望富士山〉「惜非吾土難淹留，王孫芳草空幽幽」、〈自宮之下  
溫泉冒雨下山，仍宿塔之澤環翠樓〉「終已非吾土，豈得長盤桓？」（第 12 集，  
頁 191）中「悵悵」、「惜非」、「終已」可見，家國憂思一再提醒自己這只是暫  
留之地。

對故國的憶想，具體化為行動或文學上的姿態，就是身體朝向與眺望。例如  
〈登樓〉：「蓬萊回首望神州，大海波濤蕩不收。」〈將去日本，示從亡諸子梁任  
甫、韓樹園、徐君勉、羅孝高、羅伯雅、梁元理〉：「華嚴國土吾能現，獨睨神州  
有所思。」（第 12 集，頁 194）〈答山本憲〉：「哀我北首望，瀛臺幽神堯。」  
（第 12 集，頁 195）諸如此類的描寫不少，尤有象徵意味的是〈己亥元旦與王  
照、梁啟超、羅普在日本東京明夷閣望闕行禮〉：

曉日曛曛射北扉，遙從海外起朝儀。  
仰看北極瞻丹闕，立對東風認紫微。  
去歲走趨穿陞仗，今晨顛倒乏宮衣。  
逋臣西望腸堪斷，故國雲飛有是非。（第 12 集，頁 195）

康有為率弟子向清帝遙拜，將不能親身參與的朝會，透過儀式及文學，召喚出種種  
想像與回憶。這些想像與回憶，彷彿成了一個虛擬的「國中之國」，在異國舞臺上  
搬演。另外，我們可以留意到，這首詩使用了很多有關方位的修辭。首四句想像身  
在故國，「北扉」、「北極」、「東風」都指示著王權的所在以及作者朝向的中  
心；「西望」一句回到身處的日本，雖然回到現實，但依然「西望」故國。以上詩  
歌中的身體朝向與眺望的動作，看似與「思君」、「登樓」一類詩歌的文學修辭無  
別，但當書寫背景移到了作為中國「周邊」的日本，就凸顯了作者以故國為地理及  
情感的中心、以所在地為「周邊」的意義。

在《明夷閣詩集》中，也並非沒有走出「周邊」的作品。1899 年康有為經加  
拿大至英國，橫渡大西洋時寫下〈四月乘船渡大西洋近北極，曉見二冰山高百丈，  
自北冰海流來者，船人傾視，誠瑰瑋大觀也〉。詩歌在修辭上調動不少神話典故，  
將情景描寫成仙界，使讀者如親見海外奇景，誠為海外詩的佳作；然而大量使用海  
洋及相關神話典故，雖是海外詩傳統寫法，卻未展示出近代的海洋意識及地理與文

明的關係。試看〈己亥二月由日本乘“和泉丸”渡太平洋〉：「老龍噓氣破滄溟，兩戒長風萬里程。巨浪掀天不知遠，但看海月夜中生。」（第 12 集，頁 196）同樣是首次橫渡太平洋，同樣是從日本出發，但較諸梁啟超之作，此詩的修辭和內容無疑是傳統的。雖然流亡日本時期的康氏，已讀過地理與文明關係的一些著作，但地理環境決定論並未在其詩展現，逋臣心境及故國憂思始終是詩歌的基調。

1900 年春，康有為應邱煒菱 (1874-1941) 之邀赴新加坡，其間往來新加坡、丹將敦和檳榔嶼，至 1901 年底離去。比諸文化、地理上接近中國，且成為文明開化強國的日本，新馬在地理、文化上位於漢文化圈的邊緣，向來被中土視為蠻荒，卻又是多元文化、民族的交流之地，是「海洋亞洲的中心」、「亞洲的地中海」。康氏在前往新加坡的船上，便已產生了複雜的體驗。試看〈己亥十二月廿七日，偕梁鐵君、湯覺頓、同富侄赴星坡。海舟除夕，聽西女鼓琴。時有偽嗣之變，震蕩余懷，君國身世，憂心慘慘，百感咸集〉：

天荒地老哀龍戰，去國離家又歲終。  
起視北辰星闇闇，徙圖南溟夜濛濛。  
亂雲遙接中原氣，黑浪驚回大海風。  
腸斷胡琴歌變徵，怒濤竟夕打艨艟。（第 12 集，頁 201）

此詩原題〈己亥除夕七洲洋舟中感懷〉，過了七洲洋便算進入南洋。康氏被迫離開日本，前往遙遠的異域，中原的政局是「星闇闇」，南洋的前程則是「夜濛濛」、「黑浪驚回大海風」，陌生而不明朗，但他如「亂雲」的心情猶「遙接中原氣」。西女「胡琴歌變徵」，象徵著即將離開中國，進入華洋雜處的異域。<sup>44</sup>

康有為避地新加坡的情懷，依舊如在日本之時，充滿故國憂思。北望、北眺引起的故國想像與回憶，依然常見。方位與向背反映了中國作為精神世界的中心，亦是價值與意義的核心，所以，他仍然帶著回憶與流散的創傷來審視這片異域。遇上華人社區過元夕，他慨嘆：「舊國煙花重此見，新亭風景泣何言。」（第 12 集，〈星坡元夕，鄉人張燈燃爆，繁鬧過於故國。觸緒傷懷，與鐵君、覺頓、同富侄追思鄉國〉，頁 201）「新亭」的典故又再出現，召喚地域轉變下的熟悉景象。寄寓

<sup>44</sup> 值得一提的是丘逢甲同年的〈七洲洋看月放歌〉亦寫到「中有蠻姬十隊並作天魔舞」、「東音西音四起聲咿嘍」，同樣以不同種族的雜處象徵此水域的混雜性，暗藏對文化及朝貢體系的隱憂。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卷 7，頁 162。

客雲廬時，又有「廿載銀塘舊山夢，忘情忽倚澹如樓」之感（第 12 集，〈寓星坡邱菽園客雲廬三層樓上，憑窗覽眺，環水千家，有如吾故鄉澹如樓風景，感甚〉，頁 201）。當他離開新加坡的華人社區，遷往檳榔嶼時，遇到「蒼籐纏樹花生頂，紅布圍身金墜唇」的異地風俗時，就「酒醒夢回腸斷處，長天萬里是燕秦」（第 12 集，〈檳嶼漫行遇西人元日感嘆〉，頁 210），喚起對故國的追憶。〈庚子七月居檳嶼督署，今已辛丑六月，手種藤已花矣〉更說明風俗差異始終提醒著他的異地之感。詩歌描寫康氏休憩時看著當地人工作，既有原住民「白牛牧已狎，烏蠻語少解，兩耳掛寸環，鼻珥燦光彩」，也有「婉變印度婦，圈豚趨不怠。紅巾而黃裳，蔽面行皚皚」，遂嘆：「不見中土人，但與蠻俗對。」「煙潮但浩杳，中原果何在？」（第 12 集，頁 213）顯得無所適從。

康有為對異地風俗的不同態度，可以透露他對「周邊」與文明關係的觀念。日本雖與中國隔著海洋，但自李唐開始，便模仿並保存中國的制度文化，以致有一時期被包含進雖不在中國地理版圖內、卻因文化趨同而屬於中外關係中文化最鄰近的「漢字圈」之中。<sup>45</sup> 隨著文化積累越厚，日本甚至曾自以為文明的中心，「中國」與「周邊」出現「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sup>46</sup> 的逆轉。細讀康氏日本詩，可發現他並未以「蠻」、「夷」等語形容日本，反而對其保存古代中國文化，深表推崇。〈答山本憲〉就謂：「東海唇齒邦，同教望古遙。」〈日本內務大臣品川子爵以吉田松陰先生幽室文稿及先生墨跡見贈，題之〉更表示中國「儒術久矣喪，安問起傳薪？舜水發高躅，禹公搏桑濱」。因吉田松陰（1830-1859）推動王政復古，能「正學宗洙泗，高蹈抗丘墳」，而認為「諸夏愧無士，東國存斯文」（第 12 集，頁 195、193）。新加坡在十九世紀中葉後開始迎來大量中國南方移民，文化風俗都與中國相似，但儒學未盛，故他南下目的之一就是推動孔教，加上新加坡位置上又比日本更遙遠，故有「君子居夷亦何陋」（第 12 集，〈題菽園孝廉《選詩圖》〉，頁 204）的「居夷」之感。當他遷到檳榔嶼，詩中更頻繁出現「蠻」、「夷」、「奴」、「鬼」等字詞，而這些字詞在傳統中，不管是地理還是文明，都有相對於「中國」為中心的「周邊」意義。

1901 年底康有為離開南洋，前往印度。高嘉謙指出：「經過旅居印度大吉嶺的幽憂放浪生活，寫作了《大同書》初稿，呈現出他跳脫帝國視域的世界主義眼

<sup>45</sup> 陶文釗編選，林海、符致興等譯，《費正清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中國的世界秩序：一種初步的構想〉，頁 5。

<sup>46</sup> 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卷 1，〈原道〉，頁 19。

光。」<sup>47</sup> 康氏帝國視野和世界視野的轉變誠然始於居印時期。面對另一種文明，使康氏逐漸開啟新的視野，在《須彌雪亭詩集》可以發現他的故國之思逐漸減少，更多的是對舍衛城、雞足山等印度歷史遺跡的考察，以較平等的態度看待中、印兩大古國的文化交流。然而，在〈自大吉嶺攜同璧女遊須彌山，行九日，深入至哲孟雄國之江督都城，英吏率國王迎於車站，入王宮，出其妃子相見，衣飾鏤器皆中國物。王拘降於英十四年，欲遁不得，見我欣然，以貝葉經、酒筒相贈，吾解帶答之，其妃以拓影相贈，璧女解玉戒指贈之，蓋故受封於我國者也〉中，康有為拜會曾為滿清藩屬國的哲孟雄（錫金）國王，看到其從官「森森漢官儀」、其妃「中華妝尚留」、使用器物「百器皆華物」，想到其國曾經「受封實藩侯」、「拱衛要荒悠」，康氏對之仍以「上國客」自居，有感「煌煌典屬業，日日蹙邊陲」（第 12 集，頁 229），對於曾經的「周邊」屬國能維持中國的文物禮儀，深感慰藉，故不以蠻夷視之。比諸他稱拜婆羅門的印度人所住村落為「蠻村」（第 12 集，〈重九登山墜馬，適遇村人拜婆羅門們〉，頁 229），透露出他帝國視野下文野的差異。

康有為對不同文明、種族的形容、用詞，折射出公羊三世說以文教為判別標準的夷夏觀；這既是其獨特處，亦是其局限處。以中華文教為判別標準，視受其文教者為文明，未受其文教者為蠻夷，而輕視其他文化獨特性，可視為古代夷夏觀的海外投射。雖然大同的最終目的是要使「遠近大小如一」，但這不過是懸於遙遠未來的空想境界，在現實之中，對不同文明、種族的歧視在詩中經常可見。特別是康氏對不同人種有很深歧見，如《大同書》說：「棕色者，目光黯然，面色味然，神疲氣繭，性懶魂愚，耗矣微哉，幾與黑人近矣！……惟黑種之人，鐵面銀牙，目光睜睜，上額向後，下頰向前，至蠢極愚，望之可憎可畏。其與白人、黃人資格之相遠也，……。」（第 7 集，頁 43）人種按膚色分白、黃、棕、黑；白、黃種人最優，易於教化，棕、黑種人最劣，難於教化，甚至只能靠「人種改良」才能漸與白、黃種人平等。其詩對南洋原住民的形容正反映這種歧視，相反地，當他在後來的詩中，形容他認為是優等人種的白人時，卻罕有如此描寫。

## （二）「嗚呼文明出地形」

真正離開地理上的「周邊」，是康有為 1903 年赴歐寫的〈地中海歌〉。康氏面對地中海複雜的歷史、地理形勢和多元文明，自有一番考察，欲梳理出文明的規則。詩中先描寫君士坦丁堡、直布羅陀海峽、黑海、大西洋、沙漠、群山圍繞地中

<sup>47</sup> 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詩、帝國與孔教的流亡〉，頁 386。

海。在此地形中，艦隊可輕易到達各處，羅馬、希臘、高盧、西班牙、埃及、阿拉伯各據險要，發展出自己的文明。詩中接著說明這些文明發展的原因：

巴比倫亞述之發生，實藉海波權先覺。  
腓尼基與迦太基，貿邊處處依海角。  
海人習海波，海商成商國。  
西頓與推羅，二市未寂寞。  
用能販易文明母，沿海華嚴成樓閣。  
羅慕路所居既得地，雖起野蠻小部落。  
憑藉海波駕樓船，鞭笞四表一統廓。

.....

地形詭異吾地稀，宜其眾國之競峙而雄立，日新而妙微。（第 12 集，頁 239-240）

最後總結：「嗚呼文明出地形，誰縱天驕此泮渌。」地中海被陸地包圍，交通方便，利於貿易；有貿易就有競爭，海權的爭奪使海軍發展迅速，因而地中海的地理塑造了歐洲人重視商業、好競爭冒險的民族性格及文明。

康氏此詩的視野、情感與日本、新馬時期的作品有很大差異，尤其當中的海洋意識在早期詩中都未見展現，也是首次明確宣示地理環境決定論。康氏予人強烈的地理環境決定論者之感，在於他此後的詩中經常以此視野審視政教與文明的成因，每到一個重要水域或國家，都考察一番，成為其海外詩的一大特點。在〈自布加利亞穿巴根山半日，北出羅馬尼亞境，乃知歐土諸岳皆穿土中，與我國相反，故諸國競立也〉中，他考察歐洲地理與政教的關係：

地中黑海多島雲，波羅的北海洲嶼尤繽紛。  
國土無數相仆緣，崎嶇各據山海濱。  
彈丸棋布二千春，莫能一統兼併吞。  
小國寡民，君主不尊。或建市府，角立斷斷。  
政體詭奇，乃地萌文。國會斯產，民權用伸。  
皆由地形所孕育，非關人力能陶甄。（第 12 集，頁 287）

由於島嶼眾多，難以一統，據地而立的國家面積小、君輕民重，故產生國會這種「政體」。他繼而指出中國的地理形勢易於一統，能長治久安，總結如下：

彼今物質日新研，遂闢海力啟坤乾。  
 憲法庚庚起民權，假不菲薄互資焉。  
 水流沙轉是天然，我言地形為政魂。（第 12 集，頁 288）

又如〈遊希臘畢感賦〉敘述希臘文明民權平等的傳統源起於該地海盜平分贓物的作法，海盜性格後來又影響其他國家掌握海洋霸權。

雖然〈二十世紀太平洋歌〉首先引入地理環境決定論，卻是經由康有為重複強調和詳細書寫，此論觀點才成為康氏海外詩的特徵。地理環境決定論本身有牽強和臆測的問題，加上康氏性格獨斷，使得他過分強調地理因素的必然性而否定其他因素，正如上引解釋地中海周邊國家的情況——「皆由地形所孕育，非關人力能陶甄」——以「普遍原理」遮蓋問題的複雜性。不過，這是時代的局限，並非康梁獨有，在當時西方和日本都相當普遍，現代地理學家多視為膚淺之論。<sup>48</sup>

康有為通過對地形與文明的考察，發現當時有能力殖民海外、通商致富的，都是航海技術發達、握有海權的國家。1890 年美國馬漢 (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 出版《海權對歷史的影響 1660-1783》，系統地提出海權論。1897 年嚴復在〈再論俄人代守旅順大連灣事〉雖未使用「海權」一詞，但已使用馬漢海權論的概念。<sup>49</sup>「海權」一詞在其 1898 年〈擬上皇帝書〉「蓋英之海權最大，而商利獨閎」<sup>50</sup>已使用；1899 年譯亞當·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的案語中，更屢次使用「海權」一詞，如論英國所以強的原因之一，是「無地不可與水通。……此所以能獨握海權，牢籠商務，駕萬國而上之」。<sup>51</sup>學者認為「1900 年 3 月前，馬漢的海權論已由嚴復本人及其譯稿在其交往圈中傳播」。<sup>52</sup>稍後《東亞時報》又載日人劍澤鈞徒

<sup>48</sup> Ishikawa Yoshihiro, "Liang Qichao, the Field of Geography in Meiji Japan, and Geographical Determinism," pp. 167-171.

<sup>49</sup> 王栻主編，《嚴復集》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461-465。

<sup>50</sup> 同前引，第 1 冊，頁 69。

<sup>51</sup> 亞當·斯密著，嚴復譯，《原富》（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4），頁 448。

<sup>52</sup> 王榮國，〈嚴復海權思想初探〉，《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廈門：2004），頁 46。



（生卒年不詳）所譯《海權對歷史的影響 1660-1783》第一章部分。<sup>53</sup> 汪榮祖認為康氏於 1900 年可能已閱讀過不完整中譯本，<sup>54</sup> 但康氏更可能早已從嚴復的著作中接觸此理論。

海權論的核心精神，如嚴復在《法意》的案語說：「往讀美人馬翰所著《海權論》諸書，其言海權，所關於國之盛衰強弱者至重。古今未有能奮海權而其國不強大者。」<sup>55</sup> 黃克武總括嚴復強調的是海權涉及政治與國家貧富強弱的關係，嚴復強調海權的重要性：「一，海權涉及政治與經濟兩個面向，關係到國家的貧富強弱和國際地位高下；二，不締造海權，陸權也只能隨之喪失；三，中國應在日本海、渤海、黃海、東海和南中國海等海域建立制海權，規劃海軍，實行海上交通控制，拒敵於海洋國土之外。」<sup>56</sup> 而影響海權的因素，馬漢列出地理位置、形態構成、領土範圍、人口數量、民眾特徵、政府特徵六項。<sup>57</sup> 康氏詩中對此亦多所留意，如〈自布加利亞穿巴根山半日，北出羅馬尼亞境，乃知歐土諸岳皆穿土中，與我國相反，故諸國競立也〉討論國家強弱與地理、人口、國土面積、政制的關係；〈睹荷蘭京博物院製船型長歌〉則強調艦隊的重要，他認為：「中國海疆七千里，太平洋岸臨紫瀾。大地全勢唯我有，樓艦可以答百蠻。」（第 12 集，頁 255）中國地形兼有廣袤的陸地和非常長的海岸線，接連太平洋，理應結合陸權和海權，經略海外。最後，他舉出列強因廣建艦隊而稱霸的例子，總結如下：

艦隊第一為海霸，能擒陸霸拿破侖。  
故知海力最無上，於今新世尤居尊。  
縱覽荷蘭船口型，感嘆彼得木屋勤。  
藐爾荷蘭強若此，況於中華萬里雲？  
嗟哉誰為海王圖，鐵艦乃是中國魂。（第 12 集，頁 256）

<sup>53</sup> 關於海權論之傳入可參同前引，頁 40-48；周益鋒，〈“海權論”東漸及其影響〉，《史學月刊》，4（開封：2006），頁 38-44；馮志陽、侯傑，〈近代啟蒙思想家嚴復的海權思想——一個有關馬漢海權思想引介與運用的考察〉，收入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主辦，《國家航海》第 4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 20-27；黃克武，〈從“海防”到“海權”：甲午戰爭 120 週年的省思〉，收入郭陽、王記華主編，《甲午戰爭與東亞近代歷史進程：甲午戰爭 12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第 1 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頁 47-56。

<sup>54</sup> Wong Young-tsu (汪榮祖), "The Search for Material Civilization: Kang Youwei's Journey to the West," *Taiw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5.1 (2008), p. 44.

<sup>55</sup> 王棫主編，《嚴復集》第 4 冊，頁 1001-1002。

<sup>56</sup> 黃克武，〈從“海防”到“海權”〉，頁 52。

<sup>57</sup> 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著，熊顯華譯，《海權論》（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19），頁 25。

中國國土比荷蘭廣闊得多，荷蘭能憑藉艦隊一度稱雄海洋，中國自然有此可能。

### (三)進化的藍圖

除貿易航行與海上力量，康有為還有一個特殊的建議——殖民海外。馬漢指出開拓殖民地是海權的一個重要因素：「從廣義的角度來看，影響國家海上權利的更重要的因素往往是一個國家國民的聰明才智，即他們是否有開拓健康的殖民地的能力。」<sup>58</sup> 康氏到美洲，思考大片土地本來無人利用，因航海者發現後加以發展，未久即成富強國家，他因而明白開發新地的重要。他在 1895 年〈上清帝第二書〉中就因人口滋生、貧困者多，而有移民墾荒的提議：「西北諸省，土曠人稀，東三省、蒙古、新疆疏曠益甚，人跡既少，地利益以不開，早謀移徙，可以闢利源，可以實邊防，非止養貧民而已。」（第 2 集，頁 41）同年又因其門人曾得巴西國王許諾以四百里地予中國人移殖，而有「吾若遷民往，可以為新中國」的計畫，擬組殖民公司，租船往巴西，並將計畫告知李鴻章（1823-1901），得李鴻章許可，待與巴西通商事成而實行，不過終因通商不成而不了了之。<sup>59</sup>

康氏親赴美洲後，重提此計畫。〈九月二十二重泛大西洋〉闡述此意：「若非冒險科倫布，十萬里新大陸今猶莽榛柯。野人盤據狂狽舞，豈睹文明繁盛之國家。」（第 12 集，頁 259）然後說中國人口過多，應移民開闢新國土。〈巡覽全美國畢，將遊巴西，登落機山頂放歌七十韻〉敘述北美由蠻荒發展到先進文明，更通過中西文明比較的大格局，夾敘夾議，具體展示其文明進化的觀念。詩中敘述北美資源豐富後，回顧古代中國之發展：「回顧我中國，三代文化卓。江南粵蜀閩，尚為蠻夷穴。羅施南詔在宋時，猶為鬼國之部落。寰中開闢艱遲猶如此，何況長城外東西北之三角。」再指出古代歐洲開發，同樣漫長，「無有若美之速攫」。可見他離開中國的「周邊」後，以中國文明為標準來衡量其他文明的視野，轉為嘗試以其他文明的標準回顧中國文明。他又藉中、歐歷史闡述各地域最早開闢的中心地帶，發展已經飽和，「勿爭朝市棄荒原」，應該開發周邊或海外土地（第 12 集，

<sup>58</sup> 同前引，頁 41。

<sup>59</sup> 吳天任，《康有為年譜》（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頁 137-138，引文見頁 138。康有為在其《我史》中亦有記載。晚清時人對「殖民」的普遍認知是指移民墾荒，康氏亦然；從他得國王承諾、組公司、租船，並以通商為前提的細節可見，此「殖民」計畫相當低姿態，實與通過軍事手段的「殖民主義」(colonialism) 不同。關於晚清對「殖民地」概念的理解，詳參潘光哲，〈從“新名詞”到“關鍵詞”：以“殖民地”為例〉，收入孫江、陳力衛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 2 輯（北京：三聯書店，2014），頁 229-254。

頁 268)。

古代「中國」的「周邊」，向來被視為文化、生產力落後的蠻荒，但若以美國的例子觀之，新世界正因蠻荒而擁有可以快速發展的豐富潛力，後進反而成為先進。康有為認為關鍵在於殖民：

我將殖民巴西地，樓船航渡歲億千。  
樹我種族開我學，存我文明拓我田。  
移民迅速殖千萬，立新中國光亘天。  
既救舊國開新國，我族既安強且堅。(第 12 集，頁 268)

通過殖民來擴大帝國疆域，使教化廣被，正是「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的過程和手段，如學者所言：「這仍基於《公羊》三世說，立太平世界，所以說開我學以鑄新國，或者是存我文明，立新中國。」<sup>60</sup> 文明教化的傳播是殖民的重要向度，所以，在康氏的進化藍圖中，人口遷移固然重要，「殖文化」才是殖民持久的關鍵。葛兆光談到帝國的「周邊」如何由「外」成為「內」時，就指出：「隨著移民（或者殖民）的日益加速度，越來越多的區域也漸漸『漢化』而成為『中國』；但最後則是制度趨同和文化認同」。<sup>61</sup> 所以康氏希望殖民之餘，還要「存我文明」、「開我學」。他在〈考驗太平洋東岸南北美洲，皆吾種舊地〉中進一步為殖民巴西尋找歷史依據，通過實際考察，羅列論證，說明南北美洲大陸曾有中國民族移民，這些民族「或者三苗舊蠻族，或者渤海扶餘裔，或者文身斷髮出吳越，少被文化無通裁。各以國風與野俗，行之新陸傳云來。文者開文明，野者山澤化日頹」（第 12 集，頁 269）。這些「中國」的「周邊」民族正因「少被文化」而「日頹」，無法在新大陸建立文明，益見文教的重要。康氏認為近代西方的物質文明固然是中國所不及，風俗教化卻是中國文明之長。在西方文明輸入中國的當時，他卻反而希望藉殖民將中國文明輸往西方，籌謀一個突破困局的計畫。馬漢論殖民地的用途，是與經濟貿易掛鉤，殖民地除了提供各種資源和市場，亦用於商船隊的停泊、中轉、避風、維修，從而展開貿易；然而，康有為對此卻無著墨。不以經濟貿易而以文明傳播為殖民的重點，與他對公羊理想的堅持不無關係。

<sup>60</sup> 丁亞傑，《清末民初公羊學研究：皮錫瑞、廖平、康有為》（臺北：萬卷樓圖書，2002），頁 48。

<sup>61</sup> 葛兆光，《歷史中國的內與外》，頁 39。

美洲原住民由華夏東遷的說法，並非康氏首唱。早在十七世紀已有法國學者認為《梁書·諸夷傳》中「扶桑國」便是美洲。<sup>62</sup> 輯譯於 1850 年代的《地理全志》(*Universal Geography*) 已載：「〔亞墨利加〕內州太古之時，荒遠難稽，惟自墨西哥迤南諸部，訪之尚存古蹟。攷其肇造之初，尚近禮儀，頗似亞西亞東南規制，以是觀之，大都州內之民，自其地遷來者，日漸衰微。」<sup>63</sup> 《萬國史記》所載更為詳細，書中先述自墨西哥以南的建築古蹟及人形石像都與印度（印第安）人異，便說：「意古時有數百萬開明之民立國，會有大變，人物一切蕩滅。印度人自亞細亞遷徙也，或疑往昔韃靼人，經白令峽，抵亞美理駕。見最北所存之物最古，迤南漸新，則其說亦非無理。」<sup>64</sup> 而《萬國史記》為萬木草堂規定讀物，故康氏對此說法早已知悉。<sup>65</sup> 梁展認為此理論不只作為他以「無主荒地」(*terra nullius*) 的先占原則來殖民巴西的合法性依據，同時說明了墨西哥和巴西並非「夷地」，而是中國的舊地，給予中國人重回故地的合理性。<sup>66</sup> 不過，古時東遷的既是不被中國承認的蠻夷，以其遠遷之地為華夏舊地，這種辯解無疑牽強；更何況這些「蠻夷」早因「少被文化」被取代，現實中的新國家與之幾無關係，康氏重返舊地的理據難免淪為空想。

出國後的康氏親歷西方科技強大，深知貿易航行、海上力量和殖民海外，都要有強大國力支持，強大國力又以物質、科技的發展為基礎，因此其歐美之行，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考察西方的物質文明，並於 1904 年寫成《物質救國論》，認為「方今競新之世，有物質學者生，無物質學者死」，而「中國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講物質之學而已」（第 8 集，頁 63）。他每到一個重要城市，都會留意其物質科技的發展，不少詩都記錄了考察的過程和心得。例如〈遊蘇格蘭京噫顛堡，見創汽機者華忒像，感頌神功，不可忘也〉：

<sup>62</sup> 羅榮渠，《美洲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扶桑國猜想與美洲的發現——兼論文化傳播問題〉，頁 44-75。

<sup>63</sup> 慕維廉 (William Muirhead) 輯譯，《地理全志》（上海：墨海書館，1853），卷 4，〈亞墨利加州全志〉，頁 5a。

<sup>64</sup> 岡本監輔，《萬國史記》（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華國堂藏本），卷 19，〈亞美理駕史〉，頁 1b。

<sup>65</sup> 關於康有為對此說的接受，詳參梁展，〈文明、理性與種族改良：一個大同世界的構想〉，收入劉禾主編，《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北京：三聯書店，2016），頁 142-161。

<sup>66</sup> 同前引，頁 155-156。

汽機創自英華忒，水火相推自生力。  
汽船鐵軌自飛馳，縮地通天難推測。  
萬千製造師用之，卷翻天地先創極。  
汽機製器日日新，凡十九萬五千式。  
力比人馬三十倍，進化神速可例識。（第 12 集，頁 258）

不只歌頌蒸汽機改變世界，連其款式、馬力都詳細道出。〈遊山泵，觀彼得學舟之遺屋。板屋丈許，床灶蕭然，几榻敞帷，猶存如故。前俄皇亞力山大為覆大屋焉〉有感：「歐人所由強，物質擅作器。百年新發明，奇偉不可比。遂令全地球，皆為歐人制。」（第 12 集，頁 256）〈巡覽全美國畢，將遊巴西，登落機山頂放歌七十韻〉則指出美國的開拓比其他國家快，是因為「蓋從機器備文明，更賴鐵軌縮地岳。一通汽車四十年，萬里山河野蠻成神仙。農家樓閣丹青靚，工人士女衣帶鮮」而後來居上，可為中國效法（第 12 集，頁 268）。

汪榮祖指出，康氏認為人類文化和歷史進化都遵從同一規則，物質文明是普遍進化的產物，一個民族的進化程度可由其物質成就來判斷。<sup>67</sup> 在遊歐之前，康氏認為進化的關鍵是文教和制度；遊歐以後，對物質的重視大幅提升，甚至認為物質才是進化的重點。他在《物質救國論》說：

故道德之文明，可以教化至也；文物之文明，不可以空論教化至也。物質之學，為新世界政俗之源本，為新世界人事之宗祀。不從物質學措手，則徒用中學之舊學，固不能與之競，即用歐美民權、自由、立憲、公議之新說，及一切法律章程，亦不能成彼之政俗也。（第 8 集，頁 84）

不過，高揚物質並非摒棄教化，而是要相輔相成，以之為基礎與後盾，可以最大程度推動教化。他的殖民願景與西方以經濟利益為主導的殖民主義不同，是有著「王化」色彩的進化思想在地理向度上的展現。但其使殖民地歸化中華文明的理想，以及對棕、黑人種的歧視，勢必改變當地原本的文化；這是否也如同西方殖民者以文明開化為口實的文化侵略，值得深思。

傳統的「中國」觀念，是以諸夏為中心，將最遠的地區視為荒服、藩服。葛兆光回顧古代「中國」、「華夏」的內、外概念，指出內外之分不一定具明確的地理

<sup>67</sup> Wong Young-tsu, "The Search for Material Civilization," p. 35.

邊界，而是只要認同「中國」、「華夏」的文化制度，接受其文化，就被納入其範圍，所以這種內與外，更多是一種文化的向度。何休解釋《公羊傳》的義例，給予康有為理論的依據，「以公羊三世說為據敘述全球歷史，今文經學的應用範圍隨之突破了“中國”的範疇」。<sup>68</sup> 當然，大同境界是一個遙遠理想。在古代「海」是有邊界意義的，「四海之內」就是以海為界限。當近代中國面對同樣有著高度文明的西方列強，西方文明及海洋同時成了「王化」的限制。現實中若要突破限制，首先要發展物質文明，建立可以遠渡重洋的海上力量，再進行殖民，使教化可以推廣至大洋的彼岸。

由於康有為三世進化不能躡等的理論及保皇立場，使他雖然崇拜哥倫布的功業及美國的物質文明，卻始終反對中國實行共和，對自由民主充滿戒心。康有為的性格「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清代學術概論》，頁3097）。他對物質的追求以及篤信三世進化不能躡等，造成對其他因素的忽視。例如將中西方強弱的差異一逕歸咎於物質發展，就輕視了近代西方經濟與物質發明背後之民主自由的重要性。他在考察時經常藉著一些國家因革命而導致衰亂的歷史來佐證其看法；如遊義大利時指加富爾 (Cavour, 1810-1861)：「當時革命民主論紛紜，獨以專王違俗說。遂以分裂十一邦，竟能統一國獨立。」（第12集，〈初登歐洲陸奈波里，遊公園即睹意相嘉富洱像，喜賦〉，頁242）遊德時指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當時與法鄰，革命鼓大興。惟公審時勢，君權救國命。」（第12集，〈遊柏林議院，前有俾士麥像，瞻望感賦〉，頁245）遊法國大革命景點時，又云：「專制鑿人聳毛髮，共和永定想叱咤。法人之舉何高滔，亂舞傴僂日可射。尊崇道理去階級，並行公產誠佳話。大同之道乃吾志，非時妄行馬礙駕。狂泉同飲眾小兒，疾行狂奔口慢罵。」（第12集，〈遊乾那花利博物院，見斷頭臺路易與爹亞像，歸過路易墳，感賦〉，頁248）他認為共和雖好，但如行之非時，就會造成混亂，血流成河。如果說康氏提倡物質文明、海外殖民是強國之方，反對共和革命就是亡國之誠，兩者相輔相成。康氏對民主自由戒慎恐懼，使其詩歌風格雖然飛揚恣肆，卻沒有梁啟超詩在強權主義、破壞主義、冒險性格、革命思想下產生的激情，以及對競爭的嚮往；兩人對如何使國家強大，看法同中有異，亦反映到詩歌上。

<sup>68</sup> 汪暉，《帝國與國家》，頁746。

## 五、不一樣的海外詩

梁啟超作為康有為學生，起初服膺師說，共同推動維新運動，隨後兩人意見分歧，漸行漸遠，但歧異之中又有一定的呼應。彼時正值兩人創作海外詩之期，他們思想上的差異也反映在詩中，已如前述。但兩人與以往的詩人相比，都具備了新的海洋意識與文明視野，共同為海外詩開出新的格局。

### (一)新海洋意識與文明視野的轉換

中古以前，中國的海洋意識淡薄；無論施政、貿易、軍事、文學藝術，都以陸地為重點。宋以前，描寫河流的舟行詩歌數量眾多，真正描寫海洋的卻很少。據吳智雄的統計，魏晉南北朝以海為題的賦有十篇，詩只有十四首；《全唐詩》中與海洋相關的只有一〇五首，實寫海洋的只有五十首。<sup>69</sup> 這些詩賦當中，又以「望海」、「觀海」的描寫方式為主，亦即作者沒有或極少航海經驗。詩賦普遍運用神話、仙話、傳說的典故，透露作者對海洋的敬畏、崇拜及想像，簡言之，是視海為平常生活中難以觸及、充滿未知的神祕領域。宋代開始，隨著貿易、戰事、海外交流的增加，詩人實際接觸海洋或航海經驗亦有所增長，很多詩已不是觀望與想像海洋，而是具體描述海洋經驗及景色，亦出現了海戰詩這種關涉國家和文化興亡的宏大敘事。記錄鄭和（1371-1433）團隊下西洋的《瀛涯勝覽》和《星槎勝覽》中，都有紀行詩記錄行程及各國地理風俗。明清之際東南沿海的海戰詩表現了詩人一定的冒險精神及英雄性格，渡海赴臺的詩歌也成為清代海洋詩重要題材。

以上的詩歌都有其時代特徵，康梁詩的時代特徵則是海洋意識的改變。王北固論歐洲與上古中國民族性格的區別時指出：

歐洲的海洋性格，以島嶼的個體性與波浪大洋的飄浮不安激變性，形成個體主義思維模式與冒險掠奪性；大陸性格的上古中國，就形成了「大同」、「天下為公」的整體博大均衡周到思維模式，與溫厚守常的中庸

<sup>69</sup> 吳智雄，〈論魏晉南北朝文學中的海洋書寫〉，《海洋文化學刊》，11（基隆：2011），頁 9-33；吳智雄，〈《全唐詩》中以「海」為題作品析論〉，《海洋文化學刊》，19（基隆：2016），頁 27-65。

主義。<sup>70</sup>

上古中國的政經和文化重點都在內陸，離海較遠，故就民族性格的塑造而言，此論有其道理。龔鵬程亦認為西方的海洋文化，「有深植其根核內的海盜性」，「後來的大規模之世界殖民，即本此淵源而來」。龔氏並指出中國對海的哲學與審美傳統中有不可狎玩、征服、對抗的極其崇高之「大」的意義：

這樣的大，又有超越世俗義，人們嚮往大海，乃是為了要超越世俗，所以不是為了個世俗之目的，如西方所強調的發財、掠獲、權力而去航海。<sup>71</sup>

隨著歷史發展而政經和文化重心向東南轉移、距海日近，加以航海技術改進，中國的海洋性格日漸增強。張高評就認為明末清初的渡臺者，往往「將大海作為冒險、征服之對象」，且不乏海盜，海洋性格已出現轉變，故其海洋書寫「表現富於冒險犯難、驍勇善戰、挑戰自然等海洋性格」。<sup>72</sup>

康梁詩更凸顯這種轉變。近代是個體覺醒的時代，國族危機下更強調新性格的塑造，〈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便表現出這種強烈的個體性。梁氏高舉強權、競爭之義，亦大異於傳統的中庸性格。康氏極為重視物質的發展，相信科技改造世界的力量，終會發展成大同世界。在科技力量下，海的神祕性減退，崇高之義被淡化，成為可挑戰、可征服、可利用的資源。海權爭奪和殖民願景都建基於科技之上，使得康梁漸向西方的海洋精神靠攏。

在詩歌主題和格局上，綜覽中國古代海洋詩歌，有不同題材，但幾乎找不到歌頌海洋文明的。這裡說的海洋文明並非指個別島國的風俗政教及興亡，而是將海洋文明視為世界文明的一個重要體系，考察其形成的因素、發展的過程、背後的精神、未來的趨向及與大陸文明的比較。宋以後的海戰詩雖牽涉區域性的國家興亡、族群流散，但都以東亞國家為主。《瀛涯勝覽》、《星槎勝覽》的海外詩雖突破東亞範圍，但旨在宣揚國威，背後是中國中心的夷夏視野。康梁詩展現的卻是海洋文

<sup>70</sup> 王北固，〈傳統中國海洋觀念薄弱的原因〉，《歷史月刊》，210（臺北：2005），頁29。

<sup>71</sup> 龔鵬程，〈海洋文化論綱〉，《華人文化研究》，1.1（臺北：2013），頁15-26，引文見頁15、26。

<sup>72</sup> 張高評，〈海洋詩賦與海洋性格——明末清初之臺灣文學〉，《臺灣學研究》，5（新北：2008），頁5、9。



明的體系：不僅限於東亞區域，而具世界性；不只是對現在的敘述，也有對過去的追溯、對未來的設想；不只是對單一文明的考察，也有大陸—海洋文明的比較；甚至希望借鑒海洋文明來提升華夏文明。這種主題與格局不只古所未有，即使在近代也是僅見的。

從本文所舉的詩例可見，康梁很少使用神話、仙話的傳統典故。如前段所述，這些典故背後帶有非現實性和神祕性，或是哲學、審美上的意義；同時，也是詩人避免（或難以）使用新名詞表達新事物，而以這些舊典故指涉新事物。康梁筆下的海洋，是一個被科學、地理知識重新理解的「水體」(waterbody)，即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 所稱「除魅」(disenchantment)，他們最關心的不是海洋的哲學、審美意義，而是作為地理資源、提升國力、改進文明的現實意義。在敘述上，這些典故或許可以使詩更顯典雅，但面對近代文明世界的複雜性，卻難以清晰表達。尤其康氏敘述、比較不同文明時，使用考察、推論、引證、歸納等寫法，需要明確、詳細的敘述方式，是舊典故難以勝任的。

最後，是支撐兩人海外詩的理論基礎——中西學術結合的新型態學術。地理環境影響人的性格、文化風俗乃至社會型態之說，古今中外皆有；然而，將之發展為一套成系統的理論，且強調其決定性的作用，將之作為普遍規律來解釋各種社會現象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卻是在晚清才由西方經日本傳入，形成了「轉型時代」重要特徵的新的「思想論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不過，維新派學術的特色之處，不在於照搬西方理論，而是在傳統中尋找思想資源，與西學結合，梁氏稱之為「新學」。梁氏詩中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就援引了生物進化論、社會進化論，又結合了三世說，欲為文明發展整理出規律。康氏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則更受海權論影響，強調在現實形勢中掌握海權的重要，以作為殖民／殖文化的手段。

新型態學術形成的新視野在維新派中並不乏見，康梁特別之處在於他們具今文經學家、改良派及詩界革命參與者的三重身分；既有今文經學吸納中西不同學術的通變性與包容性，又有從學理與現實考察中尋找公例、規律，以達經世致用的性格，同時又能大膽改革詩歌，使之成為更能表達新型態學術的工具。這三個因素，使他們具有與一般詩人不同的視野與格局。例如同是寫地中海，潘飛聲〈地中海觀日出作歌〉關注的只是「我」的遊蹤，沒有注意到地中海的地理及其在歐洲文明發展中的重要性，對沿海國家政教並無描寫。除了「火輪」一詞外，全詩看不出時代性；詩中調動「海若」、「方壺員嶠」、「徐福」、「章亥」、「博望」、「甘英」、「金銀臺」、「扶桑渚」等舊典故，雖然寫來更為典雅，卻與古人之作分別

不大，不出傳統海外詩的視野與格局。<sup>73</sup> 康氏看到的則是地理形勢與各國文明發展的關係，最後總結考察，得出「文明出地形」的結論。可見即使在同代人中，背景、動機及學術視野的不同，都影響到海外詩的時代性。

## (二) 詩歌革新的示範

梁氏夏威夷之行不只寫下〈二十世紀太平洋歌〉，還構思並提出了詩界革命「新意境」、「新語句」、「古人之風格」的「三長」。他在《夏威夷遊記》闡釋詩界革命時，一再運用航海的比喻：

故今日不作詩則已，若作詩，必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然後可。猶歐洲之地力已盡，生產過度，不能不求新地於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為詩。……今日者革命之機漸熟，而哥倫布瑪賽郎之出世，必不遠矣。（頁 1219）

革新詩歌的詩人被喻為發現新大陸、環球航海的航海家；舊詩境界被寫盡而要開發新意境，被喻為開發新大陸；海是新舊資源的區隔，海外的資源是詩歌改革「新意境」、「新語句」的關鍵。梁氏使用「必」、「不能不」、「不可不」的強烈修辭和語氣，意謂改革詩歌要有航海家般的勇氣和信心。被梁氏推為詩界革命鉅子的黃遵憲，其「新世界詩」亦是赴美後之作。<sup>74</sup> 這表明了詩歌革新與海外體驗的關係，背後也反映出遊歷距離與革新程度的正比關係。

梁氏赴日前已讀黃氏詩稿，推崇之作亦多為其海外詩，不難想像他受黃氏的影響。不過，黃氏的新語句不多，在這方面梁氏更進一步，刻意使用音譯西方地名、人名，輔以詩注解釋；同時也使用不少科技相關新名詞，如「輪船鐵路電線瞬千里」、「海電兮既沒〔設〕，艦隊兮愈張。西伯利亞兮鐵路卒業，巴拿馬峽兮運河通航」（〈二十世紀太平洋歌〉，頁 5427）。康氏有更多的海外詩，同時他親歷西方社會文化和科技發展，為了充分表達見聞，使用了更多的新名詞，並作出更具

<sup>73</sup> 潘飛聲詩：「溟溟深黑，不辨萬里之遙天，海若赫怒，鞭起蛟螭眠。火輪高高擲上三山頂，照見方壺員嶠珊瑚樹樹生雲煙。我時已登海上船，徐福導我行，章亥偕我步。數博望之舊遊，笑甘英之不渡。示我以金銀臺之梯，扶桑渚之路，虹光瀆混不能顧。」張祖翼等，《倫敦竹枝詞·法京紀事詩·西海紀行卷·柏林竹枝詞·天外歸槎錄》，《西海紀行卷》，頁 104。

<sup>74</sup> 黃遵憲，《人境廬詩草箋注》下冊，丘逢甲〈人境廬詩草跋〉，頁 1088。

體的描述，如〈地中海歌〉開首部分便是大量的地名和國家名，〈遊蘇格蘭京噫顛堡，見創汽機者華忒像，感頌神功，不可忘也〉使用「汽機」、「汽船」、「鐵軌」等新名詞。相對於早期海外詩常以傳統典故、比喻來形容新事物，或是避免在詩中直呼其名而只在注中說明，康梁更大膽掙脫舊詩語的束縛。

要能盡量運用新名詞、容納並鋪展如此豐富內容，體裁的選用是一大關鍵。在這方面，康梁之作大都是長篇古體。綜觀前述近代海外詩，一種常見的寫法是以較短小體裁，如以一首寫一事一物一景，再以聯章方式組織起來。這種寫法的好處是方便而能刻畫個別事物，但短小體裁無法承載豐富內容，難以表示複雜情節的鋪排變化和宏大敘事，特別是固定的句子長度和平仄格律下較難靈活使用新名詞，或須裁剪、壓縮詩意，使意義隱晦。另一方法是以長篇古體抒懷敘事。長篇古體較不受格律限制，句式和章法變化較自由，可容納更多內容情節，即使大量使用新名詞，由於有足夠長度作鋪排說明，能減少突兀之感，且長篇雄句易營造恢宏氣勢，宜作史詩式的宏大敘事。

梁氏對此的反思是從中西詩歌的比較出發的：

希臘詩人荷馬（舊譯作和美耳），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詩篇為今日考據希臘史者獨一無二之秘本，每篇率萬數千言。近世詩家，如莎士比亞、彌兒敦、田尼遜等，其詩動亦數萬言。偉哉！勿論文藻，即其氣魄固已奪人矣。中國事事落他人後，惟文學似差可頡頏西域。然長篇之詩，最傳誦者，惟杜之《北征》，韓之《南山》，宋人至稱為日月爭光；然其精深盤鬱雄偉博麗之氣，尚未足也。（頁 5297）

此論雖在 1902 年《飲冰室詩話》連載，但他在之前應已知悉西方長篇詩歌的以上長處。其〈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或許受此影響，發揮長篇古體的特性來作宏大敘事，詩的篇幅比大部分海外詩都要長。詩以七言為主，參以二到十三字的長短句，有助情感抑揚、語氣緩急、敘事詳略的變化，與大部分齊言的海外詩都不同。古體長篇和參差不等的句式，使在運用新名詞上有更多周旋空間，不致突兀，為舊風格如何容納新名詞、表現新意境作出示範。

尤應注意的是，此詩結構有序且嚴謹，脈絡分明。詩的開首是梁氏登場，交代寫作背景，以自己的經歷帶入世界文明的發展。由於將文明分為三階段，因此詩有了明確的分段結構。詩中次第敘述三個文明階段的特點、轉變後，將時空拉回當

下，聚焦回「我」的身上，以「我」為民族的代表，在一個充滿象徵性、帶著希望又不無懸念的場景中戛然而止。「我」既是史詩的敘述者，也是參與者，在登場與結幕之間，以海洋為舞臺，三大文明如不同的故事情節和場景轉換，由開端進展到各國衝突的高潮；除了史詩格局，此詩亦似乎有著同類詩沒有的戲劇性。

綜觀康有為的海外詩，可發現在日本及南洋之作，篇幅較後來的短小，抒懷的成分較重。赴歐之後，亦發揮古體不受句數限制、更能騰挪變化的長處，長篇之作的數量和分量有所增加，前述之作幾乎都是古體長篇。面對如此多的新事物、新知識，要書寫如此大的題目，古體無疑是最能容受豐富內容的體裁，亦更能營造恢宏、包羅萬象的氣勢。其詩語的運用如錢基博 (1887-1957) 所說：「詩如其文，糅雜經語，諸子語，史語，旁及外國佛語，耶教語。」<sup>75</sup> 加上海外詩寫海外事物，又多了西方人名、地名、新器物名，如〈巴黎登汽球歌〉有「巴黎天下大都會」、「德英羅馬俱暮暮，埃及突厥何圈豚」的西方地名，有「其俗大同無爭鬥，其世太平人聖賢」的經史語，有「或者以我惡濁世，突出諸天之外焉」的佛語，有「汽球圓圓十餘丈」的新器物名（第 12 集，頁 249）；結合多以五、七言為主，有時參以四言的雜言句子，參差變化，「如黃河千里九曲，渾灑流轉，挾泥沙俱下，崖激波飛，跳踉嘯怒，不達海而不止」。<sup>76</sup>

如果比較梁詩和康詩，可以發現兩者雖然主題相近，同樣善用古體自由變化的特點，都多用新名詞，但寫法上卻有所不同。梁詩強調「我」所象徵的民族在近代的危險與機遇，藉由理論敘述文明發展，又透過詩歌結構展示戲劇性，其詩有象徵性、抒情性、戲劇性的偏重，而少實景的、比較的、議論的書寫；康詩則特別注重後者，原因與其書寫的動機有關。梁氏書寫是為了提出海洋文明的重要，激發國人的危機感和競爭性格，因而採取「設景」的手法，用戲劇性的結構逐步凸顯海洋文明的重要，最後以激勵人心的象徵作結。康氏遊歷各國的原因之一，是為了考察西方強大的原因，這也使其遊歐後的海外詩考察成分日重。雖然這些詩不像〈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有明顯的結構，卻有經常出現的模式：先詳細描寫眼前具體的地理形勢或敘述其歷史發展，考察其得失原理，與中國情況互相比較，再將原理運用到中國未來發展的藍圖中。因此，每一首詩就像一篇考察報告，抒情少而議論多，重視事物間的關係，從中歸納出結論，加以演繹。例如〈地中海歌〉先寫地中海周圍的地理形勢，以及沿海國家的發展，得出「文明出地形」的結論；又如〈巡覽全美國

<sup>75</sup>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頁 282。

<sup>76</sup> 同前引。

畢，將遊巴西，登落機山頂放歌七十韻〉詳細敘述美國的開拓史，指出開發新地的重要，再比較中國古代與西歐的開發情況，再得出中國應殖民巴西的考察結論；〈考驗太平洋東岸南北美洲，皆吾種舊地〉更是如此，敘述見聞和實物證據後，比較中國上古民俗，得出「文者開文明，野者山澤化日頽」的結論，作為未來殖民的依據。「如何強大」的考察目的既影響詩的內容，亦影響詩的寫法，是其海外詩別樹一幟的原因。

## 六、餘論：航向現代

「轉型時代」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承先啟後的關鍵時代」。<sup>77</sup> 康梁創作於轉型時代的海外詩，同樣表徵了思想文化的過渡之義。過渡本就有由此岸到彼岸的意思：於歷史階段而言，是由傳統的此岸過渡到現代的彼岸；於康梁而言，是由大陸的此岸，經茫茫汪洋，過渡到歐美的彼岸，走出華夏中心主義，匯入列強峙立的現代文明。在詩界革命中，海外詩亦是最能體現新意境的詩歌類型之一。海外詩不只表面上記錄由東過渡到西的旅程，背後更象徵文化、歷史、文學由傳統過渡到現代的發展。

分析康梁的海外詩，不難發現當中的「啟蒙現代性方案」(the enlightenment project of modernity)。首先，梁氏意識到將處身的二十世紀是一個與過去不同的新世紀。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下，他建立起歷史必朝進步方向發展的信念，強調在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世界中強權的重要，並且表現出這種敢於競爭、熱愛冒險的新精神氣質。康氏的眾多海外詩展現其漸漸走出漢文化圈，面對西方文明的視野與心境的轉變。比起梁氏對新精神氣質的提倡，康詩的現代性主要表現在對科技的重視。文明之發達與否與道德無關，而在於其物質科技的發展水平。他並不視物質享受為罪惡，反而認為是進化的關鍵，能提升人的道德。他考察的重點，正在於該地商業貿易、物質科技發展的程度，以及是否適合殖民，當中可見現代性的萌生。

梁氏提倡敢於冒險、挑戰，熱衷競爭，追求強權的精神氣質，與康氏對科技有改天造地之能的信念，去除了傳統文化中海洋的崇高性與神祕性。海洋成為各國爭奪的地理資源，成為貿易交通的渠道，成為展示海上武力的舞臺。輪船軍艦的發展，使洶湧波濤不再難以駕馭，而是可被征服；海底電纜的鋪設，使大洋兩岸不再

<sup>77</sup> 張灝，《轉型時代與幽暗意識》，〈轉型時代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與文化史上的重要性〉，頁 151。

隔閡，而是可以互相通訊。康梁之作不只減弱了海洋的崇高性、神祕性，也走出華夏中心主義，以較平等（甚至嚮往）的態度面對其他國家。即使較諸近代其他詩人，康梁因其學術背景及處身政治、詩歌改革運動的中心，更得時代風氣之先。他們對世界的新視野，以及對中國未來參與海洋競爭、進化到新階段的設計，展現了一幅在時空的廣度與用意的深刻上都前所未見的圖像。

在對海洋「除魅」之餘，海外詩對海洋的描寫也與過去有別，最明顯的是康梁很少使用傳統海外詩中經常出現的神話、仙話典故。除了由於海洋的神祕性、未知性減退外，也因為這些典故難以有效描述複雜的現代文明；反而詩界革命提倡新意境、新語句，大膽以新詞新事入詩，有助於表述，書寫的方式亦因兩人的寫作目的而呈現各自的特色。海外詩成為詩界革命的重要成果和示範，康梁展示的不僅是世界發展的圖像，也是詩界革新的圖像。

（責任校對：吳克毅）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王 棻 Wang Shi 主編，《嚴復集》*Yan Fu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6。
- 丘逢甲 Qiu Fengjia 著，丘鑄昌 Qiu Zhuchang 校點，《嶺雲海日樓詩鈔》*Lingyun hairi lou shichao*，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9。
- 何 休 He Xiu，《春秋公羊經傳解詁》*Chunqiu Gongyang jing zhuan jiegou* 第1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8。
- 岡本監輔 Okamoto Kansuke，《萬國史記》*Wan guo shiji*，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六年 (1900) 華國堂藏本 Hafo daxue Hafo Yanjing tushuguan cang Qing Guangxu ershiliu nian (1900) Huaguotang cangben。
- 康有為 Kang Youwei 撰，姜義華 Jiang Yihua、張榮華 Zhang Ronghua 編校，《康有為全集》*Kang Youwei quanji*，北京 Beijing：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2007。
- 張祖翼 Zhang Zuyi 等著，穆易 Mu Yi 校點，《倫敦竹枝詞·法京紀事詩·西海紀行卷·柏林竹枝詞·天外歸槎錄》*Lundun zhuzhici, Fajing jishi shi, Xihai jixing juan, Bolin zhuzhici, Tianwai guicha lu*，長沙 Changsha：嶽麓書社 Yuelu shushe，2016。
- 梁啟超 Liang Qichao，《梁啟超全集》*Liang Qichao quanji*，北京 Beijing：北京出版社 Beijing chubanshe，1999。
- 黃遵憲 Huang Zunxian 著，錢仲聯 Qian Zhonglian 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Renjinglu shicao jian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7。
- 劉義慶 Liu Yiqing 撰，劉孝標 Liu Xiaobiao 注，王根林 Wang Genlin 校點，《世說新語》*Shishuo xiny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2。
- 慕維廉 William Muirhead 輯譯，《地理全志》*Dili quanzhi*，上海 Shanghai：墨海書館 Mohai shuguan，1853。
- 韓 愈 Han Yu 著，馬其昶 Ma Qichang 校注，馬茂元 Ma Maoyuan 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Han Changli wenji jiaozhu* 上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4。

## 二、近人論著

- 丁亞傑 Ting Ya-chieh, 《清末民初公羊學研究：皮錫瑞、廖平、康有為》*Qingmo Minchu Gongyangxue yanjiu: Pi Xirui, Liao Ping, Kang Youwei*, 臺北 Taipei: 萬卷樓圖書 Wanjuanlou tushu, 2002。
- 川勝平太 Kawakatsu Heita 著, 劉軍 Liu Jun 等譯, 《文明的海洋史觀》*Wenming de haiyang shiguan*, 上海 Shanghai: 上海文藝出版社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 2014。
- 王北固 Wang Bei-gu, 〈傳統中國海洋觀念薄弱的原因〉“Chuantong Zhongguo haiyang guannian boruo de yuanyin”, 《歷史月刊》*Lishi yuekan*, 210, 臺北 Taipei: 2005, 頁 27-33。doi: 10.6796/HM.200507.0027
- 王榮國 Wang Rongguo, 〈嚴復海權思想初探〉“Yan Fu haiquan sixiang chu tan”, 《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Xiame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3, 廈門 Xiamen: 2004, 頁 40-48。
- 石雲豔 Shi Yunyan, 《梁啟超與日本》*Liang Qichao yu Riben*, 天津 Tianjin: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2005。
- 吳天任 Wu Tianren, 《康有為年譜》*Kang Youwei nianpu*, 廣州 Guangzhou: 廣東人民出版社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2018。
- 吳智雄 Wu Chih-hsiung, 〈論魏晉南北朝文學中的海洋書寫〉“Lun Wei Jin Nanbeichao wenxue zhong de haiyang shuxie”, 《海洋文化學刊》*Haiyang wenhua xuekan*, 11, 基隆 Keelung: 2011, 頁 9-33。doi: 10.29473/OJ.201112.0002
- \_\_\_\_\_, 〈《全唐詩》中以「海」為題作品析論〉“*Quan Tangshi zhong yi ‘hai’ wei ti zuopin xilun*”, 《海洋文化學刊》*Haiyang wenhua xuekan*, 19, 基隆 Keelung: 2016, 頁 27-65。
- 志賀重昂 Siga Sigetaka, 〈亞細亞地理考究之方針〉“Yaxiya dili kaojiu zhi fangzhen”, 《湖北學報》*Hubei xuebao*, 2、3, 武漢 Wuhan: 1903, 頁 1-5、6-11。
- 李歐梵 Leo Ou-fan Lee 演講, 張曉旭 Zhang Xiaoxu、劉雨薇 Liu Yuwei 整理, 〈西學東漸：晚清文學中的烏托邦想像——“中西文化關係與中國現代文學”系列演講第二講〉“Xixue dongjian: wan Qing wenxue zhong de wutuobang xiangxiang: ‘Zhong xi wenhua guanxi yu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xilie yanjiang di er jiang”, 《關東學刊》*Guandong xuekan*, 2, 長春 Changchun: 2018, 頁 51-70。
- 汪暉 Wang Hui, 《帝國與國家》*Diguo yu guojia*, 《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Xiandai Zhongguo sixiang de xingqi* 上卷第 2 部, 北京 Beijing: 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 2004。



- 沙紅兵 Sha Hongbing, 〈晚清海外詩：“從周邊看中國”〉“Wan Qing haiwai shi: ‘cong zhoubian kan Zhongguo’”, 《文學評論》*Wenxue pinglun*, 1, 北京 Beijing: 2018, 頁 111-122。
- 亞當·斯密 Adam Smith 著, 嚴復 Yan Fu 譯, 《原富》*Yuan fu*, 北京 Beijing: 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Beijing shidai Huawen shuju, 2014。
- 周益鋒 Zhou Yifeng, 〈“海權論”東漸及其影響〉“‘Haiquan lun’ dongjian ji qi yingxiang”, 《史學月刊》*Shixue yuekan*, 4, 開封 Kaifeng: 2006, 頁 38-44。
- 季岸先 Ji Anxian 選輯, 《中國古代海洋意象史輯》*Zhongguo gudai haiyang yixiang shi ji*, 青島 Qingdao: 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 Zhongguo haiyang daxue chubanshe, 2010。
- 林肯·潘恩 Lincoln Paine 著, 陳建軍 Chen Jianjun、羅燦英 Luo Yiying 譯, 《海洋與文明：世界航海史》*Haiyang yu wenming: shijie hanghaishi*, 新北 New Taipei: 廣場出版 Guangchang chuban, 2018。
- 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 Alfred Thayer Mahan 著, 熊顯華 Xiong Xianhua 譯, 《海權論》*Haiquan lun*, 北京 Beijing: 中國社會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chubanshe, 2019。
- 浮田和民 Ukita Kazutami 著, 羅大維 Luo Dawei 譯, 《史學通論》*Shixue tonglun*, 上海 Shanghai: 進化譯社 Jinhua yishe, 1903。
- 高嘉謙 Ko Chia-cian, 《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 (1895-1945)》*Yimin, jiangjie yu xiandaixing: Hanshi de nanfang lisan yu shuqing (1895-1945)*,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 2016。
- \_\_\_\_\_, 〈近代漢詩與南海視域〉“Jindai Hanshi yu Nanhai shiyu”, 《臺大東亞文化研究》*Taida Dongya wenhua yanjiu*, 5, 臺北 Taipei: 2018, 頁 119-136。doi: 10.6579/NJEAC.201804\_(5).0007
- 常雲 Chang Yun、謝飄雲 Xie Piaoyun, 〈論康有為的海外詩〉“Lun Kang Youwei de haiwai shi”, 收入劉聖宜 Liu Shengyi 主編, 《嶺南歷史名人研究》*Lingnan lishi mingren yanjiu*, 廣州 Guangzhou: 中山大學出版社 Zhongshan daxue chubanshe, 2002, 頁 127-176。
- 張灝 Chang Hao 著, 任鋒 Ren Feng 編校, 《轉型時代與幽暗意識——張灝自選集》*Zhuanxing shidai yu you'an yishi: Zhang Hao zixuanji*, 上海 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18。
- 張高評 Chang Kao-ping, 〈海洋詩賦與海洋性格——明末清初之臺灣文學〉“Haiyang shifu yu haiyang xingge: Mingmo Qingchu zhi Taiwan wenxue”, 《臺灣學研究》*Taiwanxue yanjiu*, 5, 新北 New Taipei: 2008, 頁 1-15。

- 梁 展 Liang Zhan, 〈文明、理性與種族改良：一個大同世界的構想〉“Wenming, lixing yu zhongzu gailiang: yi ge datong shijie de gouxiang”, 收入劉禾 Lydia H. Liu 主編, 《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Shijie zhixu yu wenming dengji: quanqiu shi yanjiu de xin lujing*, 北京 Beijing: 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 2016, 頁 101-161。
- 郭延禮 Guo Yanli, 〈論康有為的海外詩〉“Lun Kang Youwei de haiwai shi”, 《東岳論叢》*Dongyue luncong*, 6, 濟南 Jinan: 1984, 頁 64-69。
- 郭雙林 Guo Shuanglin, 《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Xichao jidang xia de wan Qing dilixue*,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0。
- 陳清茂 Chen Ching-mau, 《宋元海洋文學研究(上)》*Song Yuan haiyang wenxue yanjiu (shang)*, 新北 New Taipei: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Huamulan wenhua chubanshe, 2011。
- 陶文釗 Tao Wenzhao 編選, 林海 Lin Hai、符致興 Fu Zhixing 等譯, 《費正清集》*Fei Zhengqing ji*, 天津 Tianjin: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1992。
- 湯志鈞 Tang Zhijun, 《近代經學與政治》*Jindai jingxue yu zhengzh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9。
- 程 露 Cheng Lu, 〈清末民初“航海詩”的特徵及其現代性——以廣東文人黃遵憲、梁啟超、丘逢甲為例〉“Qingmo Minchu ‘hanghai shi’ de tezheng ji qi xiandaixing: yi Guangdong wenren Huang Zunxian, Liang Qichao, Qiu Fengjia wei li”, 《廣東開放大學學報》*Guangdong kaifang daxue xuebao*, 26.5, 廣州 Guangzhou: 2017, 頁 26-30。
- 馮志陽 Feng Zhiyang、侯傑 Hou Jie, 〈近代啟蒙思想家嚴復的海權思想——一個有關馬漢海權思想引介與運用的考察〉“Jindai qimeng sixiangjia Yan Fu de haiquan sixiang: yi ge youguan Mahan haiquan sixiang yinjie yu yunyong de kaocha”, 收入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 Shanghai Zhongguo hanghai bowuguan 主辦, 《國家航海》*Guojia hanghai* 第 4 輯,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3, 頁 20-27。
- 黃克武 Huang Ko-wu, 〈從“海防”到“海權”: 甲午戰爭 120 週年的省思〉“Cong ‘haifang’ dao ‘haiquan’: Jiawu zhanzheng 120 zhounian de xingsi”, 收入郭陽 Guo Yang、王記華 Wang Jihua 主編, 《甲午戰爭與東亞近代歷史進程: 甲午戰爭 12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Jiawu zhanzheng yu Dongya jindai lishi jincheng: Jiawu zhanzheng 120 zhounian guoji xueshu yantaohui wenji* 第 1 卷, 北京 Beijing: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18, 頁 47-56。

- 黑格爾 G. W. F. Hegel 著，王造時 Wang Zaoshi 譯，《歷史哲學》*Lishi zhexue*，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1956。
- 葛兆光 Ge Zhaoguang，《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Lishi Zhongguo de nei yu wai: youguan "Zhongguo" yu "zhoubian" gainian de zai chengqing*，香港 Hong Kong：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2017。doi: 10.978.988237/0142
- 潘光哲 Pan Kuang-che，〈從“新名詞”到“關鍵詞”：以“殖民地”為例〉“Cong ‘xin mingci’ dao ‘guanjianci’: yi ‘zhimindi’ wei li”，收入孫江 Sun Jiang、陳力衛 Chen Liwei 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Yazhou gainianshi yanjiu* 第 2 輯，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2014，頁 229-254。
- 蔣俊 Jiang Jun，〈梁啟超早期史學思想與浮田和民的《史學通論》〉“Liang Qichao zaoqi shixue sixiang yu Futian Hemin de *Shixue tonglun*”，《文史哲》*Wen shi zhe*，5，濟南 Jinan：1993，頁 28-32。
- 蔣英豪 Chiang Ying-ho，〈梁啟超的“史詩”——《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析論〉“Liang Qichao de ‘shishi’: *Ershi shiji Taipingyang ge xilun*”，《求是學刊》*Qiushi xuekan*，4，哈爾濱 Harbin：1997，頁 68-73。
- 錢基博 Qian Jibo，《現代中國文學史》*Xiandai Zhongguo wenxue shi*，上海 Shanghai：上海三聯書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2014。
- 羅榮渠 Luo Rongqu，《美洲史論》*Meizhou shi lun*，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09。
- 譚勇輝 Tam Yonghuei，〈《大庇閣詩集》與康有為的南洋詩〉“*Dabige shiji yu Kang Youwei de Nanyang shi*”，《粵海風》*Yuehaifeng*，1，廣州 Guangzhou：2015，頁 19-25。
- 龔鵬程 Kung P’eng-ch’eng，〈海洋文化論綱〉“*Haiyang wenhua lungang*”，《華人文化研究》*Huaren wenhua yanjiu*，1.1，臺北 Taipei：2013，頁 1-32。
- 志賀重昂全集刊行會 Siga Sigetaka zensyuu kankoukai 編，《地理學》*Tirigaku*，《志賀重昂全集》*Siga Sigetaka zensyuu* 第 4 卷，東京 Tokyo：志賀重昂全集刊行會 Siga Sigetaka zensyuu kankoukai，1928。
- Ishikawa Yoshihiro. “Liang Qichao, the Field of Geography in Meiji Japan, and Geographical Determinism,” in Joshua A. Fogel (ed.), *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4, pp. 156-176.
- Wilhelm, Hellmut. “The Poems from the Hall of Obscured Brightness,” in Lo Jung-pang (ed.), *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Tucson, AZ: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7, pp. 319-340.

Wong Young-tsu. "The Search for Material Civilization: Kang Youwei's Journey to the West," *Taiw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5.1, 2008, pp. 33-59. doi: 10.6163/tjeas.2008.5(1)33

## **Geography, Evolution and Civilization: Images of the World in Overseas Poems by Liang Qichao and Kang Youwei**

**Kong Hiu-fa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konghiufai@gmail.com

### **ABSTRACT**

Overseas poems, a neglected type of poetry,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ization. The modern era was not only a critical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but it was also a time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overseas poems. Due to their academic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s as well as their travel experiences, the overseas poems of Kang Youwei 康有為 (1858-1927) and Liang Qichao 梁啟超 (1873-1929), which represent the apex of the genre, show a pattern absent in the poems of other contemporary poets. Their poem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theories of geographical determinism and evolutionism. They wanted to find decisive factors regarding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and they summed up the laws affecting evolution such as geographical location, sea power, material resources and colonization, which could be used as points of reference in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Their vision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we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Han centralism of the past, in that they embodied the turn of facing the ocean and actively merging into modern civilization, presenting a macro image on a world scale.

**Key words:** overseas poems, Liang Qichao 梁啟超, Kang Youwei 康有為, geographical determinism, evolutionism

(收稿日期：2021. 10. 29；修正稿日期：2022. 2. 16；通過刊登日期：2022. 4. 13)

